

复旦管理评论

SCHOOL OF MANAGEMENT
FUDAN UNIVERSITY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刊

Dec. 2021
/NO.60





相辉

04 苏步青:尺牍中的家国情怀

博学

13 深度扎根统计学,拥抱数据新趋势
15 立足中国市场特色,延伸学科研究边界
17 凸显营销学科属性,促进实践与理论平衡
20 紧跟科创战略,适应学科发展新趋势

知行

24 刘蓉:深耕公益,让世界变得更好
28 陈潇斐:走在公益路上的第十一年
32 谈杨:孩子的梦想,就是我们的真爱
36 周洋:做探路人,行公益路

笃志

41 关若萱:新的征程 尽情书写
44 武岳志:这是我梦想发芽成长的地方
46 郑秀:奇妙且收获满满的旅程
48 周瑞民:冷静的头脑,火热的心肠
50 周润秋:保持好奇,笃定前行

近思

54 用数据创造价值
54 生物技术成硬核
55 创造力与组织管理
56 用知识穿透迷雾
57 如何应对低利率
57 游戏产业正循环
58 “无收入极限生存时长”
59 理性看待“元宇宙”
60 产业链如何自主可控
61 人工智能的“真相”

CONTENTS

WWW.FDSM.FUDAN.EDU.CN

第六十期

- 62 数字化不能唯技术论
- 63 数字化转型本质是人的转型
- 64 半导体产品策略“三部曲”
- 65 电动汽车补贴的组合效应
- 66 平台经济的科学监管
- 67 企业的“三商”
- 68 企业要做长期主义
- 69 企业的护城河和成长性
- 70 现金流管理策略
- 71 北交所应尝试 T+0
- 72 供应链管理的本质
- 73 智慧和德行
- 74 数字营销的三个优势
- 75 市场营销学科的未来
-
- 78 李天纲:海派文化的渊源及其传承
-
- 88 iKwok 奖学金捐赠
- 88 EMBA 人文盛典举行
- 89 最佳国资基金管理人
- 89 四大项目全球 50 强
- 90 “瞰见”对话科创人物
- 90 “全球最佳”继续领先
- 91 JMS 学术年会举办
- 91 自科重点项目交流会
- 92 2021 复旦管理学论坛
- 92 学生成长基金理事会会议
- 92 “瞰见”对话科创人物年度论坛

海派

日历

苏步青：尺牍中的家国情怀

文 / 陈启明

编者按

苏步青(1902-2003),浙江平阳人。数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现代数学的奠基人之一,创建了中国微分几何学派。1931年获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历任浙江大学教授、数学系主任、教务长。1952年调入复旦,曾担任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教务长、副校长、校长(1978-1983)。在仿射微分几何学、射影曲线论、射影曲面论、高维射影空间共轭网理论、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计算几何等领域有重要贡献,尤其以发现“苏锥面”和“苏链”著称。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2019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将编号为297161号小行星命名为“苏步青星”。



书信乃二人之间交流,随心随性所写,没有掩饰,更不造作,尤可见真性情、真学问,也是研究一位大家的重要资料。在七十余年的工作生活中,苏步青喜欢并擅长写信,至古稀之年仍坚持有事写信、有信必复的习惯。本人在工作中有幸整理苏步青与其长女苏德晶之间的书信,这批家书时间从1972年6月9日至1995年6月11日,共237通。鱼封雁帖,见字如面,字里行间不仅洋溢着苏步青对家庭的责任与关爱,

而且充满了他对教育和科学事业的执着,以及一心为党为人民的家国情怀。家书中所涉及的内容几乎囊括了他晚年的所有工作,谓之苏步青的简本回忆录实不为过。家书映照历史,家书窥见心灵,品读这一封封苏步青亲笔书写的尺牍,仿佛在触碰这位“东方第一几何学家”“数学之王”的炽热的爱国情怀,感悟一位献身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共产党员的坚定党性和高尚品格。今天是苏步青先生诞辰119周年,谨撰此文,

以志纪念。

一、夜寒犹爱一灯明

1966年初,一场风暴席卷中国大地,苏步青受到残酷批斗,被剥夺了教学的权利,他感到愤懑、痛苦,但凭着对党的坚定信念,年逾古稀的苏步青在恶劣的环境下,仍坚持以学识报效国家。

1972年苏步青被赶到江南造船厂“改造”。那时,厂里要造一艘200



苏步青与长女苏德晶之间的书信



船体数学放样项目获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米长的轮船,就得在地上画出 200 米长的外板放样,按一比一的比例,在板上画出切割线,费时费功,效率很低,技术人员希望能够实现船体自动放样和自动切割。苏步青经过考虑,决定把数学运用到技术革新之中,把工人、技术员提出的实际问题,变为数学问题,然后再运用计算几何的原理加以解决。他和复旦大学数学系教师爬上船台仔细考察,用平行圆面数学模型方法,把曲面光滑变成曲线光滑,使问题迎刃而解。接着,他们

又把计算机用到船体放样和钢板切割中去。只要把数据输入计算机,绘图机就会伸出灵巧的手,自动绘图放大,切割机也会喷出绚丽的火花,把钢板切成预定的形状,解决了国内外造船界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使工作效率大大地提高。苏步青在给女儿的信中这样写道:“爸爸下江南造船厂已满一周,和工人老师傅、工农兵学员开始接触,我所在的数学放样车间的老师傅们尤其热情指导,恳切希望我能给他们出一臂之力去解决造

船放样问题,相处极为融洽。”(1972 年 6 月 9 日)“第一篇文章将在《复旦学报》3 期(十月份)刊登,目前正在修订第四稿,题目:《摆线和拟螺线》。”(1973 年 7 月 17 日)反复修订,四易其稿,1973 年 10 月《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正式刊登时,开篇还特意提到“本文是在工厂工人和数学系一些同志的帮助下写成的。”后来,这个项目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重大科技奖。

苏步青到上海工具厂为工人技

术员讲授数学，“爸爸从九月中旬起每周两次去上海工具厂（和平公园后面）上短训班，为期三个月。对象共九十人，大都是技术员。讲义是我系青年教师编写而由我修改成的。年纪大了，虽教不过小伙子，但还能为人民做点份内事，精神是很舒畅的。”（1974年9月29日）“爸爸前天结束了上海工具厂高等数学训练班的教学，受到厂方的鼓舞和工人学员的赞扬。其实是对自己的鞭策。”（1975年1月5日）“去年九月起到上海工具厂给工人技术员几十人上了‘曲线曲面’这门课，厂领导十分重视这项开门办学，工人们也给我很大的鼓舞、支持。结束时开了欢送会，给我系革委会送了感谢信。”（1975年2月7日）他向女儿详细介绍了下上海工具厂的情形，不仅自己教得愉快舒畅，而且还颇受工人技术员的好评。下厂时间是从1974年9月中旬至1975年1月3日，教授内容为曲线曲面，《苏步青文选》卷末附录的《苏步青教授重要活动年表》所写“1973年8月去上海工具厂劳动兼教齿轮理论课”，显为误记。

从上海工具厂返校后，苏步青仍不能上讲台教书。直至1975年3月，苏步青为复旦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专业74级讲授几何学，这是



1974年苏步青与上海工具厂的工人们在进行交谈



1977年苏步青与青年教师在讨论船体数学放样课题

他被赶下神圣讲台之后第一次上课，他在3月9日给女儿的信中写到：“我目前给哲学系自然辩证法专业一年级教数学课，每周四节，内容简单，不占用很多时间。下星期还要继续下厂。想在这基础上，写篇

把文章。”（1975年3月9日）此处信中提及的“继续下厂”仍指江南造船厂，从1972年到1975年整整三年多，苏步青每周按时到船厂上下班，爬上船台，听技术员和工人介绍船体放样工艺，了解“数学放样”的现

状。苏步青越发认识到开展应用数学的重要性,问题在于如何联系实际,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来为实践服务,他不断地为国家为民族而思考,“10月14日《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刊登了复旦科研,后面一大段讲的‘老教师’就是指爸爸,你们想必已看出来了吧。昨天,二机部在江西乐安的某厂看了这篇报道,派人来我处讨回资料。联系到这两年(《摆线和拟螺线》这篇论文发表于1973年10月《复旦学报》)各方面多次方应,可以看出理论为实践服务的重要性了。我决心坚持这一方面,继续下厂搞实际中的生产问题,做出成绩来。”(1975年10月26日)

不料,1975年12月苏步青突发脑血管病,造成肢体动作障碍,然而即使在重病中,他仍未停下对科研的思索。“这次上医院检查了来,情况有好转,不过还要继续半月,春节前是不好上班了。幸亏最近一个月中,在家里整理了两篇实际问题有关的论文,一篇已为《数学的实践与认识》接受刊登,另一篇则在《数学学报》审查中。江南厂经常有人来谈实际工作,虽然在家休息,但也觉得蛮忙。”(1976年1月8日)“在这次发病前后我又赶写了一篇齿轮设计中的几何问题的论文,现在正拟投登我校《学

报》。”(1976年3月3日)发病前后完成的这篇论文,即是后来发表在1977年4月《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的“圆锥齿轮设计中的一些几何学问题”。

“身健未愁双鬓白,夜寒犹爱一灯明。”(苏步青《陪茅诚司先生和夫人游八达岭》,作于1977年)身处逆境中的苏步青不屈不挠地坚持学术、追求真理,原来研究多年的仿射微分几何的理论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由江南造船厂船体数

学放样课题进入到应用数学的领域,以70多岁高龄开辟出了“计算几何”的新天地。

二、力挥彩笔写芳春

粉碎“四人帮”后,党组织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并委以重任,苏步青精神振奋。“爸于三日应教育部电邀来京参加邓副主席召开的小型科教工作座谈会,中国科学院和高校各有十五名科学工作者出席,上海来了四



教育部为复旦大学苏步青教授建议招收研究生发通知

人。座谈会从四日开始,预定开五天。会后教育部可能要开两三天会,回沪应在八月中旬。我已满十一年半未到首都,这次乘飞机仅一小时半就到达这里,感慨无量。大家受到邓副主席、方毅、刘西尧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并在他们亲自参加下发表自己所见,都感到无比兴奋,无比鼓舞。现在身体健康,精神焕发,心情舒畅。”(1977年8月6日)这封写在“中国北京饭店”信笺上的家书,语气中流露出无比的兴奋和喜悦。1977年8月4日至8日,在邓小平同志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苏步青控诉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包括恢复招生制度和研究生制度。“我们数学研究所秉承邓副主席指示,经教育部和上海教卫办特许,由我名义招收研究生,现第一批已顺利完成,第二批正在准备招收工作(属于教育部的全国性招考)”(1977年12月17日)而这第一批研究生,也成为粉碎“四人帮”后全国第一批研究生。

而此时苏步青的另一个心愿就是创刊《数学年刊》,在给女儿的信中他一再提及此事,“昨天接到通知,决定于后天(九月十日)飞北京向人大常委报到,预定十五日回沪,当天晚车去杭州主持教育部召开的《数学年刊》编委会成立大会。这个编委会委员36人定于十四日开幕,这样,我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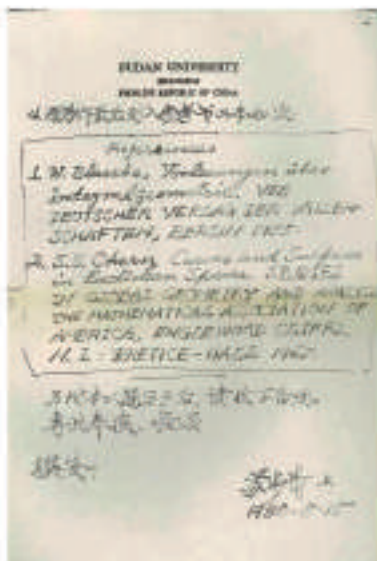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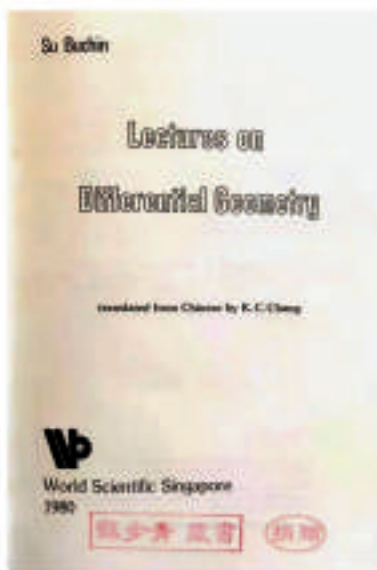


1980年《数学年刊》正式创刊,刊名由苏步青亲自题写

迟到两天,因为人大常委不许请假,只好南北奔波了。”(1979年9月8日)“我定明晨去杭州主持《数学年刊》编委会全体会议,预定十三晚回沪。十五日去宝山招待所主持另外教育部的两个会议:理科教材与应用数学,月底结束。”(1980年5月6日)“爸爸曾于9月20日赴厦门主持《数学年刊》全国编委第三次会议,从22日到27日开会、参观,并在厦门水产学院(在集美)做了报告。”(1981年10月18日)“爸爸曾于月之14日去苏州主持《数学年刊》编委第四次全体会议,21日回上海。”(1983年3月29日)早在1979年春天,在杭州举行的中国数学会理事会的会议上,苏步青极力呼

吁创办一个新的数学期刊,而由上述信中可知,他始终关注这个刊物的创办和发展。1980年旨在反映国内外数学研究最新成果的《数学年刊》创刊后,苏步青不仅亲任主编,还连续四届主持编委会,为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推动我国数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1978年至1983年,我们在家书中读到的更多的是一位国内外奔走、工作繁忙异常的父亲形象。“爸爸于月底(5月21日)赴北京出席人大常委,二十五号又赶回学校参加二十六、二十七两天校庆科学讨论报告会,以后接连地接待内外宾客,每天一班或两班,直到昨天六一国际儿童节的两次活动为止,简直是晕头转向。”(1978年6月2日)“从西德回到北京,又是第十天了。本应早日回沪,恰逢人大常委第十二次会议,又被留住了。22日由西苑旅舍搬进这里来,更高级的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官’越做越大,名气也越来越高,但不知怎样名副其实呢?幸亏身健,脑子还不糊涂,估计还可为国家出个五年八年的力吧。”“爸爸定于后天去北京,月之15日由我校数学系李大潜教师陪同出国访问巴黎应用数学研究所和法国多科技术大学,同它们签订合作协议书,并将顺访比利时Gent大学(也要签订)两三天,预定月底或七月初回来。”(1982年6月11日)“爸爸



1980年5月苏步青对《微分几何五讲》的翻译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

自春节以来,东西南北几乎无月不开会,无时不在‘此身为客’之感受中。北京已去过四趟,杭州两趟,南京和出国各一趟,尤其是,去巴黎十三天和比利时三天,使人兴起‘走遍天涯’之思。”苏步青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中,最大限度地放射出自己的光和热。

然而,身兼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复旦大学校长以来的这段时间,苏步青并未放松自己的科研工作,他利用出差途中、开会间隙甚至难得的假期看书、研究,先后出版或撰写了四部专著。“在莫干山里写了四、五万字的专著《仿射微分几何》稿,全书将有十二、三万字,预定明年三月交稿,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另一本专著《微分几何五讲》(去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已由新加坡国际科技出版社翻成英文将在九月发行。还有一本与刘鼎元(复旦数学讲师)合著《计算几何》(20万字)也将于下月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美国JohnWiley公司已来联系译成英文,但未决定,要等出书后再说。”“明年将届第八十诞辰,在美国的杨忠道(去年四、五月在上海讲学)、熊全治(今年六月在上海讲学)和谷超豪(今年七月中旬回国)等人正在商量为爸出《数学论文选集》的事宜,顺以附闻。”(1980年8月21日)信中提及的四部著作分别是《微分几何五讲》(英文版)(1980年7月出

版)、《计算几何》(1981年1月出版)、《仿射微分几何》(1982年6月出版)、《数学论文选集》(英文版)(1983年12月出版),在过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苏步青取得了一系列科学研究的新成果。

“气吐长虹连广宇,力挥彩笔写芳春。”(苏步青《新春》,作于1982年)从拨乱反正到治校治学,苏步青投注了大量精力和汗水,他把个人的奋斗融化到党的教育事业中去,实现了自己几十年都未能实现的愿望。

三、丹心未泯创新愿

苏步青教授毕生致力于数学教育事业,关心、支持基础数学教育,重视中学数学教育的改革,关心青少年的成长。1983年春天,苏步青从校长岗位上退居二线,但他仍然觉得自己心中还有一团火在热烈地燃烧,以81岁高龄,仍然关心着中学数学教育,主动提出为中学数学教师举办讲习班,指导他们用高等数学的观点看待初等数学,培训师资,以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苏步青曾说“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中小学教育搞得不好,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素



1982年苏步青与长女苏德晶在上海市委举办的春节茶话会上

质的提高,关系到祖国的大业,全社会都应关心中小学的教育,并认真抓好。”苏步青将为中学数学教师举办讲习班视为“余生之年的唯一愿望”。“爸爸身体还健壮,退居二线后行政事务全已摆脱掉,目前正在准备为中学教师开讲习班,地点定在科协,每周二小时。”(1983年12月28日)“爸爸定于月之18号(下周一)开始第二次为中学数学

教师开讲习班,每周二小时,预定明年春节前讲完。”(1985年11月16日)“从前月份起,为上海市部分中学数学教师开培训班,每周一两节,基本上由华宣积副教授讲授,不过我在上海时,一定前往旁听,并作些补充。预定于明年二月春节前结束。”(1987年12月1日)苏步青分别于1984年1月、1985年11月和1987年11月(每次三个月)为上



1991年9月《苏步青文选》正式出版

海市数学教师举办讲习班，他以自己广征博引、内涵丰富的讲课，使学员们大大开阔了数学视野。

为加强基础数学教师和教学研究人员队伍的建设，表彰苏步青对于基础数学教育的贡献，1992年9月份，在全国教师节期间，根据项武义夫妇和谷超豪夫妇的共同倡议，由复旦大学、上海市教育局、上海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联合发起设立“苏步青数

学教育奖”，苏步青被推为名誉理事长，他非常看重这一奖项，亲自参与了该奖项《章程》的制定与修改，提出了自己的评选建议。“关于‘苏步青数学教育奖’的问题，说来话长：一两年前，华人数学家项武义教授和夫人谢婉贞教授（生物学）提出每人每年捐助一万元人民币作为我校数学研究所所长发起，对中等学校数学教师的奖励金，经谷超豪教授与上海市教育局袁采局长（我数学系毕业）商讨后，扩大一些资助单位包括市教育局、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我当副理事长）等，组织一个理事会，谷超豪任理事长，定名为‘苏步青数学教育奖’，这回首次颁奖中，两个数学教学实验组和三位中学教师各分别获奖6000元和2000元。以后，每两年发奖一次，并将扩大到浙江省和江苏省去。经过就是这样。”（1992年8月31日）

从1990年起，苏步青开始抓紧时间整理文稿、诗作，出版了文选和诗集，把自己的经验和教训留给后人。“浙江科技出版社决定给我出一本《文选》，约30万字，内容除了照片（约五六十枚）、年谱、著作目录外，大致分为教育、科学方面的演讲、学会和学术活动的致辞、各方面数学论著的序文；300首旧体诗等三部分，本年9月间就

要发稿。最后部分的诗抄由我自己选录，目前整理的差不多，其余两部分以及照片收集则由王增藩、李大潜、蒋培玉等三位同志负责。”（1990年7月19日）“这两个月来，主要忙于整理我的旧诗词稿子，一共搜集了三百五十多首，和其他平常发表于报刊上、教育思想和学术奉献有关的文章包括数学论文总目录（中外文），给浙江科技出版社提供了《苏步青文选》约四十多万字材料。前月底交了稿，预定明年四月出版。”（1990年12月23日）1991年9月《苏步青文选》正式出版，江泽民总书记为该书题词“弘扬科学精神，振兴中华民族。”是浙江科技出版社为浙籍科学家编选的第一部文选。

“丹心未泯创新愿，白发犹残求是辉。”（苏步青《九十书怀》，作于1991年）透过这些家书，我们得以重温苏步青为教育和科学事业艰苦奋斗的历程，并为其无私奉献的赤子之心和大家风范所感染。尺牍文字朴素平实，却不乏即时性和鲜活性，在私语化文本中呈现了无比崇高的家国情怀，这对于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苏步青学术历程和教育思想都极富意义，值得我们每一位复旦人珍视。F

（本文转自复旦大学档案馆官方微信“复旦记忆”）

博学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践和创新正加速涌现，理论创造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请听四位系主任谈学科的发展趋势、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并解读未来的师资建设、学术研究、人才培养……



深度扎根统计学,拥抱数据新趋势

“统计学系”更名“统计与数据科学系”后采访系主任郁文教授



记者:请您谈谈当今世界统计学的发展新趋势和新方向?

郁文:总体而言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大数据的发展给统计学带来了新变化。统计学本身是研究数据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处理,从数据当中挖掘信息的学科,与大数据存在密切的关系。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当今的数据呈现出数量大、种类多、产生速度快的特点,数据量的累积与数据形式的多样化对传统统计方法提出了挑战,于是统计学的理论和计算机算法产生融合,催生出“机器学习”,也就是基于数据的智能化学习,这是统计学目前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

第二,适应了世界统计学科发展的新方向。从欧美到中国,很多最顶尖的统计学家都认为,统计学的理论与技术必须与具体场景相结合,与领域知识相融合,变成更具实践性的学科。统计学、机器学习以及领域知识的融合,正在逐渐塑造出一个新的数

据分析的学科方向,就是数据科学。正因为如此,数据科学是统计学未来发展的新方向,因为两者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相同,基本的理念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数据科学中包含很多现代化的算法,在数据的表达、模型的构建等方面与传统统计学有较大的不同,更能满足未来发展的需求。

第三,统计学科更名已经成为了近年来国内外主流大学的趋势。北美不少顶尖大学的统计系都进行了更名,比如沃顿和耶鲁从“Department of Statistics”改为“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and Data Science”,在强调统计学的重要地位的同时,更多地倾向于多学科的交融。国内也有几所学校也改了名字,例如新成立的南方科技大学,直接设立了“统计与数据科学系”,厦门大学也将系名改成了“统计学与数据科学”,南开还专门成立了“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大势所趋。

记者:统计学的边界拓展适应了学科的新发展,您怎么看待统计学科

——
统计学本身是研究数据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处理,从数据当中挖掘信息的学科,与大数据存在密切的关系。

的新趋势对师资和学生的影响？

郁文：事实上，除了上面所提到的适应统计学最新的发展方向这一愿景，我们的更名也考虑到了师资引进、学生培养、学院发展这几项因素。

从师资引进的角度而言，近年我们希望多引进计算机和统计学领域的复合型人才，例如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方面的人才。如果还叫做“统计学系”，对于这类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不是很大，因为他们可能对我们系是否仍然偏向传统数理统计存在顾虑；而更名后，我们系的发展方向就很明确了，对于师资引进大有裨益。比如我们明年将入职的一位老师是复旦数学本科、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博士毕业，现在在百度做数据科学职位的博士后，将来打算主攻深度学习，他就是很典型的复合型人才代表。

从学生培养的角度来看，对学院新成立的“DSBA”项目（数据科学与商务分析）来说，系名改成“统计与数据科学”，两者实现了无缝对接。对于本科生而言，由于国外的数据科学现在是大热的方向，系名的更改将助力他们今后申请、报读国外的相关学

位。至于硕博学生，这种转变也表示系里将开设课程帮助他们提升在算法、编程方面的竞争力，有利于他们未来的学术研究和工作发展。

最后从学院的角度来说，希望我们系的改名也能助力学院的科创战略，凸显数据分析的重要性，从而更好地推动学院与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相关的科创企业进行学界业界之间的交流。

记者：从学科内部的角度来看，“数据科学”和“统计”之间呈现的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郁文：尽管从技术层面上看，数据科学发展迅速，但从学科角度来说，它目前还无法上升到学科的地步，因为它尚未形成对世界认知的系统化思想，所以我们现在不会直接叫“数据科学系”，毕竟我们系的传统根基还是在于统计，统计学科不会消失，只是在经历一段融合的过程。我们把“统计”放在学科名的前面，本身就是尊重历史发展的体现。此外，现在系内十几位老师中绝大部分还是做统计的，数据科学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向、一种趋势。

记者：在开头的学科发展中，提

及了要把统计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相结合，那在实际的学术研究和给学生的授课中，老师要如何实现理论高度和现实案例的平衡？

郁文：从我们老师自身的研究而言，应该更多地去拓展自己的边界。比如我所接受的是传统的数理统计训练，要自我提升就必须拓展边界，多去了解注重实际商业应用的人是如何理解数据分析的，从而增加自己在数据科学方面的实践。

从学生培养的角度来说，对于硕博生我们仍然非常强调基础理论的训练，因为学科仍然扎根在统计，他们毕业所拿的也仍然是统计学的一级学科学位。但我们会给学生加点码，让硕博生经历更多计算机的训练，要让他们写程序的能力更加提升；对于本科生我们也会适当进行调整，希望年轻老师们在现有的课程大纲体系下，给本科生加入机器学习的新内容、介绍新的思想方法。至于DSBA和MBA项目的培养，则会更多地侧重介绍统计对商业场景的应用，不仅要培养他们的数理背景和计算机编程能力，还要让他们兼具商业逻辑、充分发挥管院的优势所在。**17**

立足中国市场特色,延伸学科研究边界

“财务金融系”更名“金融与财务学系”后采访系主任蒋肖虹教授



记者：“财务金融系”和“金融与财务学系”，有哪些差异？

蒋肖虹：我们系以前叫“财务金融系”，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妥。在日常交流中，经大家一简化，往往就被简化成了“财务系”，听起来感觉更注重企业和公司的财务管理，但其实我们系涉及的内容比公司财务领域要宽得多。此次更名就是想避免这种局限于财务领域的认知误区，强调“金融市场”在我们培养机制和研究内容中的重要性。

此外，我们还更换了“金融”与“财务”的先后顺序。国外对应的系名是“Department of finance”，其中“finance”到底是金融还是财务，早期翻译过来的时候没有明确清楚。我们希望更靠近国际标准，更凸显金融的

重要性。另外，我们身处上海，上海正在打造全球金融中心，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自然是金融市场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市场法规、交易规则，模式。监管等等比公司层面的金融更广，所以更换系名可以更确切地体现我们系的内涵。

从我们系内部来看，不少老师在研究公司金融、金融工程、金融市场、金融风险管理等，所以此次更名也是希望我们在金融市场及公司金融等相关方面都能够提高及优化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能力，把金融市场、上市公司、金融科技与创新、风险与监管等都囊括进我们的研究范围。

记者：您觉得现在我们系的研究与人才培养上，要如何处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一学科是要

我们现在更注重研究方法的渐进性的变革，希望能够回答一些可能成熟市场不需要回答或者没有回答的问题，这些研究因而都具有特别的意义。

紧跟实践,还是要更注重理论?

蒋肖虹:其实金融与财务系具有很好的理论基础,需要用到包括经济学、计量学,统计,心理学等众多领域的理论知识。我们系有本科生、专业硕士,博士生和选择以财务管理作为方向的MBA学生。在我们的培养机制中,注重因材施教,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要求也有所差异:如果是财务管理的MBA学生,不会过多地对其强调理论;但对专业硕士和博士生,希望他们走在理论的最前沿。

当然,如今的金融学科,理论研究应该与实际紧密结合。比如中国宏观金融政策的变化、新交易所的设立等等,背后都有很多理论知识的支撑;金融市场的目的就是要把资源配置到市场上有需要的企业,所以在市场机制的设置、市场运行的监管等方面也需要理论引导。我们很多学生毕业后都去了金融机构工作,他们不仅要懂得理论,也要知道如何把理论应用到实践之中。此外,我们也有一些研究问题是源于实践的,比如一些老师所研究的股票质押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内容。通过这些研究,我们也希望对解决中国实践中的金融

问题有所助力。

记者:您曾在美国工作多年,基于您的观察和了解,您如何看待国内外研究水平的差异?

蒋肖虹:我觉得复旦管院的整体研究水平处在迅速增长的过程中,在某些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种比较不只是看论文数量,更重要的是看论文所具有的影响力,看这些论文中研究的问题是否对金融市场的实践有实际的引导作用。我们现在更注重研究方法的渐进性的变革,希望能够回答一些可能成熟市场不需要回答或者没有回答的问题,这些研究因而都具有特别的意义。

记者:现在国外金融领域的前沿研究中有哪些内容可以跟中国嫁接起来,为中国所借鉴?

蒋肖虹:其实国内外的金融研究上还是存在一定差距,因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还不够充分,从市场的深度、流动性、产品成熟度而言与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差异。我们加速度很快,并且有不少创新,但从总体的体量上和成熟度上还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比如我们现在引入很多新产品就是国外很多年前做的。当然,

后来者也有后来者的好处,我们现在已经跨越了盲目模仿的阶段,可以借鉴前人在成功和失败中的经验,更好地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进行深度的创新。

记者:中国市场跟美国等市场相比还是有很大差异,但同时我们的市场也具备自己的独特性,这对于研究者而言是机会还是挑战?

蒋肖虹:挑战当然有,比如我在美国研究过高频交易,但国内股票市场暂时还没有足够规模的高频交易,因此也不能做这方面的中国市场的研究。再比如在市场机制方面,中国的政策管控相当严格,熔断等市场机制尚未启动,融券市场缺乏活跃度。金融产品有待进一步发展。总体而言,中国政策因素要更多一点,国外更强调发挥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我认为,市场上没有绝对好或者绝对糟糕的政策,主要要看希望金融市场要达成什么状态和目标,并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前提下向这一方向上进行调整,从而达成一种平衡。总体来说,中国市场现处的发展阶段及独特性对研究者来说既有挑战,更是很好的机会。■

凸显营销学科属性,促进实践与理论平衡

“市场营销系”更名“市场营销学系”后采访系主任金立印教授



记者:请您谈谈“市场营销学系”?

金立印:这次更名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反映系的学科属性。在高校里,叫某某学系,能更好地体现其学术性、学科性的双重属性。比如复旦的“历史学系”、“物理学系”,在“历史”和“物理”这个名词后面都有一个“学”字,能更清晰地表明这是一门学问、一个学科、是大学下属的学术组织。原本“市场营销系”中间没有“学”字,现在加上了“学”字,能够更好地展现作为学术组织、以及一个学科的特点。

这一更名也参考了国内其他主流高校的系名。“市场营销”国外称为“department of marketing”,在国内既

有称作“市场营销系”、“营销系”、“市场营销学系”,也有叫“市场学系”的,后来北大、浙大等高校更名为了“市场营销学系”。为了反映市场营销学的学科和学问属性,我们也正好可以趁此机会修改系名,经过老师们讨论,所以最后敲定了这个“一字之差”的系名。

记者:您怎么看待市场营销学系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平衡?

金立印:实际上,系名叫“某某学系”本身也是一种用来区分实践和理论的方式,比如新闻传播可能代表了实践,但新闻传播学则代表一门学问、一种学术和一个学科。也就是说,“学”字更能体现学术、学问和学科,而不仅仅是一种实践和一种工

——
我们也希望老师能够融入管理实践,用市场营销的理论和
方法去解决一些企业管理和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作。我们更名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加“学”字来凸显出市场营销也是一门学问、一个学科。确实有些人会认为市场营销是偏实践的,但它是一所成熟的商学院必不可少的学科之一,营销科学本身也具有科学属性,是门系统性的学问。所以更改后的系名更能深度体现这种实践和科学的有机统一。

记者:未来我们系在师资建设、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有怎样的规划?

金立印:其实我们复旦管院的市场营销学科建设,不是在加强学科属性,而是从陆雄文教授在1999年牵头成立这一系那一天开始,就一直很强调市场营销的学术和科学属性。在陆雄文教授、蒋青云教授、

范秀成教授等知名营销学者的带领下,经过22年的发展,复旦管院市场营销学科的建设已经在全国乃至全球都处于非常领先的地位,也是学院的优势学科之一。未来我们更要凸显它的学科属性,强化“理论+实践”的教学培养方式。因此,我们现在招聘老师的时候,相当看重其在学术上是否有理论贡献,而且不仅是对市场营销学理论的贡献,对与市场营销学相关的一些基础学科,例如经济学、心理学最好也要有所贡献。同时,我们也希望老师能够融入管理实践,用市场营销的理论和方法去解决一些企业管理和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事实上,营销思维不仅是运用理论帮企业销售产品这么简单,社

会各个领域都需要营销的思维、理论和方法。比如现在国家关注的“碳中和”问题,就涉及到如何通过营销的方法去引导企业、消费者养成低碳消费和生活的习惯。此外,我们现在谈到的内循环问题,刺激内需也需要营销发挥作用。在未来,我们会在做好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着重强调营销科学的实践性,致力于让营销科学在更广泛的应用中发挥作用。

记者:您觉得对比国内外在市场营销学这个学科方面的研究,国内研究有哪些特点?

金立印: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营销相关数据更容易获得。国内企业在数字化营销实践方面走在全球前列,这为营销学者提供了很多新的营销现象,也创造了丰富的数

据。这些现象和数据是最早诞生于中国市场的,国内的学者们近水楼台,可以更早、更快、更方便地开展研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这类研究发表于国际顶尖营销学期刊,某种程度上也说明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和数字化营销实践的蓬勃发展,为中国学者做出全球领先的营销学术研究成果提供了天时、地利。这时如果再加上“人和”,也就是有更多高水平的营销学者投身于来自中国数字化营销相关问题和数据的研究,那么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起全球学术影响力。复旦市场营销学系也在积极鼓励老师和博士生们开展这类研究,推动市场营销学理论、实践的快速进步。

此外,市场营销学本来就是一门

复合学科,来自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都在市场营销学的研究中有诸多应用。近年来这种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愈发明显。因此我们在未来的市场营销学师资建设方面,将会更加强调学科背景的多元性,比如我们系的肖莉老师、林宸老师都有计算机专业背景、许梦然老师是心理学博士、殷云露老师具有很好的神经科学的训练。同时,我们系也正在推动跟其他系的老师联合组建跨学科的团队,围绕某一具体的“跨学科领域”开展交叉合作研究。

记者:您提到的这些新趋势对现在的营销学老师而言,是不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金立印:这些新趋势要求我们不

能自我封闭,固守以往的知识,而是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不断自我革新,否则就可能落伍。因为一方面营销的实践变化非常快,另一方面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在尝试研究一些营销相关的问题,因此作为营销学专业学者,我们要具有使命感和危机感,如果不与时俱进、不研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没有使命感)、不和企业和其他学科对话和学习(没有危机感),就会逐渐失去对实践和社会的影响力,也就慢慢地丧失了理论创新的动力。过去的22年里,复旦市场营销学科在使命感和危机感的驱动下,培养了不少人才,为社会做出了贡献。未来我们市场营销学系会继续牢记使命、常存危机意识,与时俱进、不断创新。**F**

紧跟科创战略,适应学科发展新趋势

“产业经济学系”更名为“应用经济学系”后采访系主任骆品亮教授



记者:请介绍下应用经济学系。

骆品亮:产业经济学系于2003年5月成立,迄今已18年。产业经济学系在人才培养、学科研究、商业知识传播以及咨政建言等公共服务各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应用经济学人才的新需求、学校“双一流”学科建设以及学院推进“科创战略”的新要求,结合产业经济学学科发展的新趋势,我们将“产业经济学系”更名为“应用经济学系”。

记者:未来产业经济学系将更加侧重哪些方面的研究?

骆品亮:我们从原来产业经济学领域扩大到贸易、技术经济、数字经济、劳动经济、实验经济等范围。

记者:从学科发展、师资引进、学生培养和学院战略角度,我们系将有怎样的发展新方向?有什么机遇和挑战?

骆品亮:我们的发展方向和机遇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整合优势学科资源。经过多年的发展壮大,我系现有的师资已经涵盖了产业经济学、组织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数量经济

我系将扩展研究领域内涵,满足学生对新时代商业社会变化的跨领域研究和教学需求,培养更加专业的人才。

学、区域经济学等应用经济学的多种学科领域,未来我系将继续整合各方资源发挥学科优势,推进学科发展。

第二,培养应用经济学高级人才。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经济模式变换日益频繁,新的社会问题、新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需要不同领域的经济研究从多方面进行阐释和创造性地解决。学生关注的商业实践问题也从产业战略不断延伸到微观个体/组织行为、宏观政策运行、世界经济格局等各个方面。特别是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选题不再局限于产业经

济学领域,而是贸易、技术经济、数字经济、劳动经济、实验经济等更为广阔的范围,我系将扩展研究领域的内涵,满足学生对新时代商业社会变化的跨领域研究和教学需求,培养更加专业的人才。

第三,提高国际化程度。在国内国外著名的商学院中,已设置“应用经济学系”的很多。比如,美国的康奈尔商学院、巴黎高等商学院,国内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等。我系希望通过此次修改系名的契机,研究领域扩大到经济学领域,如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等,跨领域研究,课程设置从宏观到微观全面覆盖,满足行业结构到个体行为的各方面知识需求。

第四,紧随学院的战略发展。在学院的专业学位教育中,我系目前主要承担“微观经济学”、“管理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及“产业分析与投资管理”系列方向课程。随着学院专业学位教育课程体系的修订与完善,以及“科创战略”的推进,我系紧随学院的步伐,以学院的发展方向为导向,对涉及的所有课程体系和内容的优化提升,以及不断的引进优质师资,全力支持学院发展。■





刘蓉：深耕公益，让世界变得更好

刘蓉

2009届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本科毕业生，毕业后选择进入公益组织工作，目前从事公益机构创业工作，2021年回到复旦大学就读管理学院MBA。

2021年，已经从事公益组织工作12年的刘蓉回到母校，进入管理学院MBA就读，她一面忙碌于自己热爱的公益事业，一面享受着复旦的校园时光。

投身公益：从尝试到坚定不移

2005年，刘蓉初入复旦，在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就读本科。在专业的培养中，有很多涉及社会政策、群体研究的内容，这让她有更多的机会关注社会、关注群体、关注与公益相关的现实。

基于自己的专业与兴趣，刘蓉参加了学校的社团“社会学社”，社团里的讲座、研讨和实践丰富多彩，也提供了接触各种各样与公益服务相关群体的可能，她投身其中，乐此不疲，并更加明确了自己在公益方面的兴趣，“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刘蓉将想法落于实处的决心也更加坚定，她开始思考：“既然我有兴趣，专业还比较对



口,是不是可以考虑毕业之后在这个领域工作?”

但是把想法化为实际并没有这么容易。2009年,已处于大四的刘蓉和其他的学生一样,也面临着求职的压力。而上海公益组织对外的招募的岗位少之又少,她无法确定自己能够加入公益组织,当时的她也在商业领域辗转,拿到了一家商业组织的 offer 并且顺利入职。

在商业组织报到的第三天,刘蓉突然发现,自己一直关注的公益组织信息发布平台“中国发展简报”发布了一个新的岗位——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的上海岗位,她感到惊喜,立刻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投递了简历,很快就收到了对方的回复,并顺利进行面试。第四天,她收到了 offer。

这个 offer,让刘蓉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彼时,她已经有了更多的就业选择,更多的现实条件也摆在眼前——薪资、职业规划,都是她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家人、朋友的态度也让她颇为动摇,他们普遍认为,公益组织的发展尚不成熟,收入较低,也可能限制个人的未来发展。

这些问题,刘蓉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是她谈到:“公益

组织一直以来都是我的一个兴趣所在,如果我现在不做这件事情,而选择了商业领域的工作,未来可能都不会再转回来了。”为了不让自己后悔,刘蓉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期限:在公益组织尝试两年。她用这个时间说服了自己,也说服了家人,并开始走上“两年”的公益道路,负责社区健康促进方向的公益项目管理工作。

第一个两年不知不觉间过去,刘蓉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所说的离职节点已经接近,她用手头项目多、不能随意弃之不顾来解释自己留下的原因。但与其说是不能离开,更像是她的兴趣使然,使她不愿离开,坚定不移地在公益组织领域深耕,并希望往更好的方向走去,正如她所说:“我总是觉得我前面已经做了这么多了,接下来我还可以有一个新的尝试,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说好了两年,又过两年,两年又两年,就是在不停地拖。”起初,家人还会反对刘蓉的工作,但是到了第五、第六个年头时,他们逐渐放弃了劝阻,深知刘蓉不会离开这个领域。从2009年到如今,6个“两年”也已经过去,但是她

在公益组织的道路上一路前行,穷且益坚。

公益创业:做一个“开荒者”

毕业以后,刘蓉曾先后在公益组织的社区健康领域和家庭教育领域工作过,如今自己创业,创办了大陆地区第一家专注于青少年儿童糖尿病的预防和支持的社会组织。

在前两份工作中,刘蓉所在的公益组织更注重于将服务覆盖到更广群体,进行“铺面”。而刘蓉发现,就某个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服务是自己的兴趣所在,于是,她产生了创业的想法。

2018年底,刘蓉通过同事认识了目前的合伙人。这位合伙人在12岁就患上了糖尿病,因为目前的医疗水平尚无法治愈糖尿病,他了解其他患者之苦,也希望能发挥力量,想要创办一个面向青少年儿童的公益机构,但苦于没有公益组织方面的经验。

恰好刘蓉具有丰富的公益项目管理经验,二人相识后,一拍即合,决定一起合作创业。当时的刘蓉,对于青少年儿童糖尿病领域也有自己的判断:她认为这个群体是需要服务且有明确的需求的,虽然有一些基金会涉及该领域,但是还没有专注于青少年儿童糖尿病领域的社会组织,她愿意做这个“开荒者”,她也相信,结合联合创始人人们

的经验和多元背景,大家共同努力,他们会完成这个从0到1的尝试。

2019年1月,他们开始组建创业团队并开始工作,2020年9月,小糖人青少年儿童服务中心正式注册。在投身公益组织创业的过程中,刘蓉对于这份工作有了越来越深入的理解,并且更加乐在其中。

刘蓉谈起了两个糖尿病儿童患者相识相交的故事。一个“糖宝”(对糖尿病儿童患者的称呼)因为不大与同伴交流,曾经被父母问过是不是存在心理障碍,父母的话虽然无意,但却被他记在了心里,并因此感到委屈。

在活动中,另一个心思细腻的“糖宝”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情绪,并且给了他温暖的安慰。委屈的“糖宝”因此豁然开朗,两人也成为了朋友。活动当天,给予他人安慰的“糖宝”在社工姐姐的引导下,发现了自己心思细腻的优点,他还立志,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

“糖宝”原话

这两个互相鼓励、给彼此力量的小朋友让刘蓉深受触动。刘蓉认为,很多糖尿病儿童往往有着超出那个年龄的成熟,他们十分懂事但又不失天真,“之前的理智上的判断,我觉得这个事情有价值、有可行性,到后来看到这些孩

子,我就觉得我愿意去为他们做点事情,他们太可爱了!”

求学复旦:期待所学助力公益

2021年,在公益组织工作了12年的刘蓉重新回到复旦,在管理学院读MBA,她称这一次的“回归”是一个缘分。

本科时,她辅修了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这对她后来的工作受益无穷。她发现,与其他的小伙伴相比,她常常会有意识地将一些所学的管理概念应用于工作中。但是在工作了几年之后,她逐渐发现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对于实际应用已不太够用,她开始考虑:在简单认识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如何能将工作做得更好?

刘蓉尝试着申请,最终如愿以偿,并获得了一笔奖学金,顺利入学。

如今,刘蓉已经返回校园,开始了学习之路。对于当前的课程,刘蓉颇感惊喜。她提到现在正在上《数据模型与决策》,这门课涉及的统计工具、统计概念等,刘蓉本科时期也有学习过,当时主要是基于此对社会问题进行调研和统计。而现在的这门课,则主要是从管理者的视角出发,致力于将所学运用于管理工作中。目前,作为公益组织创业者的刘蓉,有了更多的管理经验和实际需求,她发现老师讲的内容恰好落在她的需求点上,“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个工具可以这样用,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以理解,

但是在我带着问题回来的时候,就像老鼠掉进了米缸里,我会了!”刘蓉认为,从管理者的逻辑来看,知晓了某个事情的逻辑和细节后,可以更好地提出需求和为团队提供支持,更有利于进行机构管理,也与她一直从事的公益项目管理工作相契合。

在复旦,除了求学,刘蓉也在努力将公益带到更多的普通人当中。她谈到,复旦有很多热心于公益的同学,也希望在学习之余了解和接触公益,但是校内尚没有一个综合性的平台能够整合相关信息和渠道、提供多元的公益实践指导,同学们的公益认知和体验实践方式有一定的局限性。于是,她和本届MBA另外两位公益人,以及多位热心公益的同学一起,开始筹备一个公益俱乐部。他们将这个俱乐部命名为“益事荟”,希望通过互动体验、参访、讨论分享、实践等方式,让复旦的同学无论是想了解、体验公益还是想深度参与,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兴趣和专长的方式,打开对公益的想象力。

目前的刘蓉,正全力以赴地投身公益组织创业,对于当前的创业事业,她希望能够在三到五年内走上正轨,并能在公益创业的路上进行更多领域的尝试。与此同时,她也校园里不断地汲取知识,并对未来满怀期待,“希望未来我能够成为相关领域的专家,给更多的公益组织提供专业支持,通过自己的力量推动小生态环境或者是小范围公益组织的良性发展。”**F**

陈潇斐：走在公益路上的第十一年

陈潇斐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2021级MBA公益奖学金项目学生,现任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佰特公益)CEO。2010年自上海体育学院硕士毕业,随后投身公益事业11年至今,陈潇斐始终致力于为青少年儿童带去更为专业的系统的财经素养教育。从公益志愿者成长为今日的机构负责人,她坚守着公益初心,愿尽己所能助力每一个孩子拥有自由追梦的能力。

十年如一日,使命未改,初心不变

对于本硕都修读运动人体科学的陈潇斐来说,进入公益组织是一次完完全全的跨界。

在偶然的契机下,她成为了佰特公益的志愿者,作为讲师给川沙的流动儿童上课。课堂中所运用的参与式教学方法让她有了新的体验和思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通过小组讨论、案例分享、情景剧等趣味化方式让孩子们自己体验、总结和反思,陈潇斐对这样的教育方式颇为认同。她认为,当学生从心底喜欢上课,完全融入到每一环节的学习中,自然就实现了知识的内化,实现了学以致用。

佰特所阐述的财经素养教育也深深地吸引住了她。“成长过程与金钱发生的关系、经济生活中的挑战,是非常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陈潇斐说。

她真切感受到了孩子们的成长和变化。“很多学生上



完课程之后,会非常坚定地告诉我们,他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专业方向。”

一名职校生在上课后开始尝试每月定期储蓄,从一个可以坚持下来的小习惯开始,积累保障性资金,并进行不同维度的目标规划,后来顺利考上了本科。在财经素养教育中,这正是一种行为养成的方式,称为延迟满足训练。看着越来越多的孩子学会了定期储蓄和防范风险,学会了设定目标并规划好身边的资源,陈潇斐便深感自己的付出是意义的。

因为值得,所以坚持。十年如一日,从实习生到正式职员,从接手业务条线到项目总监,直至去年6月,陈潇斐以总干事的身份全盘接手了机构,负责整体统筹。与2009年成立的佰特相互陪伴,成长至今。

回望过去的十一年,其实也曾有过想要离开的打算,但陈潇斐最终还是选择了坚持。她发觉每次想要离开,都正是成长遇到瓶颈的关头。但当她正视这种瓶颈之后,就

会推动自己实现突破。迈过了三、四个这样的阶段,每一次挣扎求索后,她的视野和能力都会再一次得到提升。

陈潇斐对于物质要求不高,而是更重视与人相处中获取的精神满足。因此,她选择坚守。尽管薪资待遇没有那么优渥,但每每听到受益者的反馈、目睹“两流”儿童点点滴滴的变化时,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让每一个孩子都拥有为自己梦想买单的能力,这是每一位佰特人不变的心愿。正是这种公益使命和情怀指引着她一路走了下去,直至今日,她依然毫不犹豫地说:“工作这么久,我从来没有哪一刻感觉找不到价值。”

学习,为了更好的自己

佰特是陈潇斐做过的唯一一份工作,一路从业务条线成长起来,在去年接手机构后,她发现自己的管理经验和

知识不足以处理工作中面临的问题。而从长远发展来看，她也有着改革机构松散化管理方式、提升机构服务效能的想法，这需要进行相应系统化的知识储备。

无论是机构的发展战略，还是人事的组织架构，乃至公益端的产品设计，非盈利组织的底层逻辑与理论工具都与商业是一致的。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让公益适配市场变化。这促使她萌生了攻读MBA学位的念头。

曾就读于复旦MBA沪港班的机构创始人王胜老师向陈潇斐大力推荐了复旦MBA项目，并鼓励她申请公益奖学金。但现实条件严苛，家住南京，学校却在上海，育有两个学龄前的孩子，还面临着频繁到各地出差的情况……想来已觉分身乏术，但陈潇斐仍然下定了决心。在家人的支持下，她一路过关斩将，成功实现了求学目标。

再次回到睽违已久的校园，坐在教室里的她觉得自己“又年轻了几岁”。入学数月，丰富的课程与活动纷至沓来。一面是理论的积累：会计基础、信息系统管理、企业战略管理、数字化应用……一面是人与人的联结：学院和班级的创新活动、社群的交流、小组间的互动……脱离于现有的思维模式，看看书、讨论一下作业，陈潇斐“在新鲜中

保持着学习热情”。

带着机构转型的需要去汲取知识，在实践的过程中总结反思，如果遇到问题，又可以请教老师和同学。在这种边学边做的循环里，她逐渐找到了适宜的节奏与方向。

工作、家庭、学业，如何平衡三者的关系，有不少人都曾问过陈潇斐这个问题。她坦言，其实很难真正达到平衡。

“只能让自己多辛苦一点，但难免有亏欠的。”她总是细致做好日程规划，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尽可能压缩行程回家陪伴孩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她也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出差，引导他们参与到公益项目中，以此获得不一样的成长体验。

财经素养教育，助力自由人生

财经素养教育，听起来是一个小众话题。但实际上，财经素养的培育对现代社会中的青少年儿童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孩子们以此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学习基础财务知识，提升财务风险的防范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还能

够养成规则意识、成本意识和创新意识,做到“我选择,我负责”。

根据不同年龄段,财经素养教育也有其不同的侧重点。在4-6岁的幼儿阶段,更多地注重财富观念的启蒙,帮助他们理解财富不只是金钱,也包括健康、友情、时间、资源;在6-12岁的小学阶段,则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目标意识和行为习惯,促使他们制定目标,并通过记账、预算、理性消费等行为去实现;在青年阶段,一些孩子可能面临社会生活的挑战,所以在基础财务管理之外,还融入了就业、创业相关的技能培训。

多年来,佰特公益通过和教育部门、NGO、基金会等主体合作,为偏远山区的留守儿童、城市的流动儿童以及城市职业学校的青少年普及财经素养教育,已累积覆盖30个省市255个区县,服务超过1200多所学校,惠及670万人次。

“让孩子们更好地防范风险、设定正确的财务目标,是这份公益事业的整体目标,也是我的事业价值所在。”陈潇斐说。当他们从小就拥有了这方面的意识和能力,就更有底气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创造独立而美好的、有价值的人

生。

但她也意识到,如果仅用这样小而美的方式进行财经素养教育推广,很难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公众倡导,也无法让更多弱势群体受益。因此,她希望未来能通过促进政策优化,扩大品牌影响力传播,获得更多人支持。

她身边的许多亲友都成为了“月捐人”,定期对公益项目进行小额捐赠,甚至复旦MBA的同学还会带着孩子一起参与到公益项目中去。公众对于公益的认知,近几年已有显而易见的进步。从以往的捐钱捐物,到如今发挥自己所长、尝试参与公益行动,践行公益的形式也越来越多元。

“和孩子一起读绘本,和青年一起上街做反诈宣传,或是发挥专长为公益人提供咨询服务,这都是公益的体现。”陈潇斐说。这样的行动既帮助了别人,对自身能力也有一定提升。

“可能每个人支持和付出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但是只要大家了解、认同公益这件事,往往都会以各种形式参与进来。公益一事,道阻且长但值得!”怀揣着这一份信念,陈潇斐使命未改,初心不变,在公益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F**

谈杨:孩子的梦想,就是我们的真爱

谈杨

201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前往云南担任了两年乡村教师,而后加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2021年,进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攻读MBA学位,成为第一批公益奖学金的获得者之一。

在公益、商业、大学间来回奔波的背后,是他和一群公益人探索「非营利组织的管理」的故事。

从支教到教育公益事业

最早接触到公益,是在大三的一次纪录片课程拍摄中。谈杨和同学走入了一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学校,在跟踪拍摄中,他看到了许多未曾设想的问题:未来的学习权利难以保障;被迫参与大量的爱心活动引发学生的厌恶情绪;社会支持与孩子的现实需求不匹配等等。

大四后,谈杨进一步接触到了美丽中国(Teach For China)的云南支教项目。能够有两年的时间驻扎在乡村,这让他萌生了报名的念头。在他看来,只有眼睛向下看、双脚向下走,才能理解一线现实,为种种困惑找到出路。

2014年7月,谈杨奔赴云南,成为了一名大山深处的乡村中学老师。两年支教的经历让他深刻体验和反思了中国的基础教育和公益事业。在那里,他看到了基层乡村教师难以突破的人生发展之路以及随之而来的职业倦怠,也目睹了成长的环境如何形塑着学生。



谈杨越发意识到,仅凭支教是无法系统性地重构教育生态的。一两个外来老师的作用微乎其微,“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细枝末节的方案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整合运用社会资源,寻找现实的解决方案,才能突出重围。

自此,谈杨决定真正迈入教育公益行业。他目前工作于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负责一家教育进修学院的运营与管理。真爱梦想以“让每个孩子自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为愿景,筹措社会善款,整合来自高校、企业以及社会公众的力量,为老师、校长等教育体系工作者开发和提供全身心的支持,尤其注重对于偏乡地区老师的帮助。

一切答案都在教育现场。在谈杨看来,扎根在课堂一线,进入到教育发生的现场去观察和分析,才能真正理解儿童、理解教师、理解整个社区。他提到:“公益看上去是献爱心的事情,但其实必须做得很专业,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否则就是对受助人的伤害,也是对捐赠人

的不负责任。”

从新闻跨界到教育行业,谈杨在实践中得以快速地成长为了一个具备专业视角、专业方法的公益人。而昔日在新闻学院结交的朋友们也给予了他支持,“去关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不平等关系,为无声者发声,让社会变得更好,这是我们的共同理想。”

在奋斗的道路上,他更收获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秉着一颗为公益奉献的纯粹的心,尽管身边的人几乎都是70、80后,大家却总能超越年龄的代沟,建立起一种彼此平等、相互关怀和信任的伙伴关系,这样的共同体也令谈杨格外珍惜。

回到校园

2020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正式设立MBA公益奖学金项目后,真爱梦想潘江雪理事长找到了谈杨,希望他能

够代表基金会的伙伴们回到校园学习。

“跨界共治”是潘江雪在创办和发展真爱梦想中所秉持的理念之一，以公益人的身份和视野，进入到商业领域进行跨界学习，对真爱梦想而言，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对于复旦管院，他更补充道：“这样一家学院和这样一群校友愿意为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系统而慷慨的支持，所呈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意识足以使人动容。”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曾说，非营利组织的存在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迫切需要大量的总结经验、关注其实际情况与焦点问题的资料。“而非营利组织和商业公司有许多大的概念是相通的。”谈杨说。在商业管理中丰富的议题，包括系统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架构等等，都是值得公益组织学习和研究的地方。

但他也提到，一些关键性的议题需要从商业公司的成熟的管理经验中进行转换和再研究。例如公益组织中有效管理志愿者推动机构运作的问题，在商业公司和政府行业里都很少存在。因此，作为公益从业者，要能创造性地运用管理学理论，服务于非营利组织的成熟和发展，丰富本土化公益管理理论，优化公益行业的具体实践，探寻公益实践的有效路径，这对中国公益同仁们是一个重大挑战。

另一方面，谈杨希望自己可以向复旦管院的同学们去

展现当下中国公益组织是怎样一种风景，怎样一个状态。这几个月中，他渐渐发现公益和企业双方都有强烈的合作需要，“其实不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公益组织，三方的根本使命都是为了解决社会的问题。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际上可以各取所长，协同共生。”他希望自己可以作为一扇门、一座桥，带回更多观念和思考，传递更多有价值的内容。

入学已近一学期，谈杨收获的不仅是知识，还有视野。在开学前，管院就根据行业将同学们分成了不同的小组，大家进行领域内的团队建设和风险交流互动。谈杨表示，他所在的教育与成长领域尤其让自己受益良多。

由于小组成员的多元化背景，他们得以将差异转变为资源，支持彼此的成长。一起讨论，一起学习，甚至一起参加管院的创业大赛，这样持续和深化的交流使得小组中的每个人都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也能够帮助他们推动项目优化与发展，为将来储备更多的资源。

教育公益的未来

对于教育公益领域未来的走向，谈杨的态度颇为乐观。“围绕教育的共识应该说是越来越明确了，就是教育要恢复它的公益属性，实现兼顾公平和质量的教育。”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参与到教育公益行业里来。无论是志愿者、实习生还是正式职工,90后、00后的身影涌现得愈发频繁。社会捐赠水平也在慢慢地提升,政府更有与公益行业共同提升区域教育发展质量的意愿。

当然,谈杨也指出了几个较大的挑战。第一,以公益的身份来做教育,首先还是要深刻地理解教育。学生的学习与成长都有其规律和科学性,要基于专业素养、专业认知,为不同群体设计实施有效的服务。在对教育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不明确的情况下,仅凭自己早期的受教育经历和主观经验就去服务与指导他人,其实是很危险的。

其次,在理解教育的同时,还要坚持公益的专业要求。公益资源是社会公共资源,这就要求投资管理必须公开、透明、有效。此外,如何向社会大众普及公益组织的作用,让他们在支持公益慈善的同时理解和支持公益组织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最后,还涉及到公益人才培养的问题。公益行业往往面临着很高的人员流动性,又因为缺乏系统性的专业人才培养,导致专业人才的储备不足,行业内人才缺口很难在短时间内有补给,成为了当下公益组织面临的困境之一。

最近几年,谈杨逐渐进入管理层,开始带领团队,肩负

起了机构战略决策层面更大的责任,也更加关注公益在公众生活中的角色。“中国人骨子里对于帮助他人是非常热心的,我们期待能够引导大众更自觉且持续地支持公益事业的建设。”他说。

公益的根本指向是改变权力结构不平等的关系,看到那些曾被人忽视的、始终无法公平受益的对象,既关注无法享有公平学习权的儿童,也关注被侵害的动物、被污染的环境……但这也决定了公益是一件慢工出细活的事,有时慢才是快。只有充分地探索试错之后,才能找到多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背后的真正症结所在。

在他眼中,受助对象的权利不是靠财富、地位所获得的,而要依靠自己内心的力量。受助人甚至公益从业者自己都需要这样的力量,包括勇气,也包括信任、耐心与包容。因此,他期待着更多志愿者能够成为积极的奉献者,在心灵上长期陪伴,在行动上予以支持。

而回到谈杨个人的职业规划上,他首先希望在复旦管理学院吸收到更多的经验,将创立不久的真爱梦想教育进修学院变成一家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和公益实践力的“民间新师范”。在这背后,汇聚的是共同体的力量。

“无论教育现实如何复杂,都不放弃对梦想的执着,孩子的梦想,就是我们的真爱。”**F**

周洋：做探路人，行公益路

周洋

2002届南京大学法学院本科毕业生，2010届复旦大学管理学院MBA毕业生，2012年开始从事公益事业，至今9年。

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周洋觉得自己在30岁左右便找到了人生的使命——推广阅读，践行公益，助力他人成长。

带着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收获的新思维、同道人，周洋选择走一条艰难但有意义的公益路，他希望“让阅读成为中国教育公平与文化普惠的桥梁，为中华民族立德立心立志”。

在管院，开拓更多可能

周洋评价自己是一个穷小子，出生于江苏县城里的一个普通家庭，在读了南京大学法学专业后进入招商银行工作，2007年又进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进修。

回望40年的人生道路，周洋感叹书籍所提供的精神滋养、眼界的拓宽，读书让他受益颇多，同时，他也发现在个人成长中，在阅读方面需要很多帮助。

他的心里一直有一颗与教育、与读书相关的公益种



子：周洋的人生偶像是陶行知，作为中国人民的教育家，陶行知带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心，投入一生心血于教育事业，对我国教育尤其是平民教育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2002年，周洋从南京大学毕业，进入招商银行工作。离开学校走上社会，加上奶奶离世带来的冲击，周洋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使命”。关于“人生使命”，周洋有独特的阐释：他觉得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个人使命就是自己热爱且擅长的利他象限，在这个象限里去发光发热，服务他人，造福社会，贡献世界。

2007年，周洋26岁，已经在招商银行有了不错的发展，薪资优渥，但他自觉那个阶段自己的视野“有点窄”，顶多算一个“个人金融风险专家”。

他喜欢复旦的人文气息，又对复旦管理学院的专业文化很有好感，为了夯实管理方面的知识，更是为了拓宽自己的人生视野，他选择来到复旦管理学院读书。

在管理学院的读书经历，让周洋有了多元的思维角度，一些课程开拓了他的眼界，比如孔爱国老师开设的宏观经济学课程等，他至今脑海里还能浮现出一些当时课堂上的画面。这些学习让他领悟到了关于商业经济的思维模型。“公益需要用到一些基础思维模型，需要跟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在管理学院获得的多样的人生体验与思维模型也为他之后开创公益事业提供了帮助。

在管理学院，他也交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这些朋友也为他之后的公益路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此后，周洋也参与了一些和管理学院校友相关的工作，2011年，周洋和一些管理学院的校友们一起创办了读书俱乐部，那时候他的公益事业就有了萌芽想法。

探索，摸索一条通路

2011年，经过多年探索，加之也有着人生榜样以及多

年读书经历的影响,从管理学院毕业的周洋把“公益阅读推广”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

第二年,周洋和几个伙伴发起了针对流动儿童阅读的公益项目苗苗阅读,苗苗阅读的第一批志愿者中,就有几个人是在管理学院校友读书会的活动中招募的,周洋说,他决心在公益事业中付出行动,和管理学院老师的鼓励有很大的关系

苗苗阅读项目进行的第三年,为了更好的做公益,2015年3月,在草长莺飞、万物新生的季节里,周洋离开了工作13年的招商银行,开启了新的人生阶段——全职创办“多阅公益”机构。

当然,只有真正走进公益这个领域的人,才能明白坚持公益事业有多难。

公益行业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天然要不断失败”——这是周洋给出的答案。周洋解释,公益需要解决的是当下社会中还没有被很好解决的问题,要解决问题,就要创新,就要面对不可避免的失败。

他举了个例子:如果希望能够让流动儿童读书,就不能仅仅把书发给孩子,这样的话没人会去读,也不能仅仅去做个一两周的活动,这也不会长久。

为了让孩子们真正爱上阅读,多阅提出了构建学生、

老师、家长、校园、活动五位一体的阅读生态,其中不少事情都是从零开始,比如2015年周洋和团队想做流动儿童的家长亲子阅读培训,既没有经验,也找不到合适的老师,最终他们选择自己开发课程、自己讲课,他们常说“我们不会,但我们可以学”。

随后几年里,周洋和团队开始上海流动儿童幼儿园服务、上海随迁子女家校阅读联盟建设等行动,希望能把流动儿童学校老师、家长与孩子们都结合起来,让更多的流动儿童爱上阅读。但这件事情太难了,到了2018年,很多团队成员离开,其中很大的原因是一个字“难”,有人和周洋说“幼儿园这个项目构想非常好,但做到太难了……”,也有人说“随迁子女小学要真正改变太难了”。

从2012年周洋开始践行公益,到公益机构诞生,再到整个团队起起伏伏,这个与流动儿童阅读相关的项目一直进行到了第八年,周洋觉得多阅终于“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有效体系”。“这是挺悲壮的。”他感叹道。

不同于流动儿童阅读的公益活动,针对菜场摊贩的虹口菜场书屋摊贩读书会到现在还在艰难的摸索期中,周洋提到,有些同事走访完菜场因为被拒绝太多次都会哭鼻子,周洋觉得对公益而言,最大的难题是对一个议题付出五年甚至十年的时间,才能摸索到一条可以走得通的体系

道路。“我们干的是社会试验……我们要忍受一次次失败。”

坚持,让世界和自己都更好

践行公益事业已经九年,难题太多,但周洋从未停下开拓的步伐。

人在中年,放弃优渥的生活,甘愿清贫选择艰苦,不断失败,挑战高难度的“社会实验”,做自己心里“为国家、为社会、为服务的人群付出时间与纯粹的爱”的事业,有什么意义呢?

周洋说公益路是自己一生的修炼,“做公益只有一个目的,就你要真的帮到这些人,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只是感动自我的事。”因为自己“傻傻地坚持”了九年,周洋收获了很多“同道人”,与这些人产生“真正的心与心的交流”。他认为真正的公益需要有一颗纯粹利他的心,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做公益的人也会变得更加纯粹简单。

近十年里,周洋走访了全国一百多个学校,见到了几百个老师,仅是最近一年多时间里,他便去了四川大凉山、海南的贫困县、湖北的小村庄,江苏、云南……用身体与沟通了解这个国家流动儿童与乡村儿童的教育。

周洋透露,公益的领域需要运用到大量的社会学,教育学,人口学等等跨学科的知识,流动儿童、菜场摊贩……他们每关注一个群体,就需要大量阅读相关的研究和案例,去和这个领域的人深入交流。在阅读公益的领域内不断前行,从孩子到家长、图书馆与社区读者,从幼儿园小朋友到大中学生,他和各类阅读人群都有了比较深的连接。

为了公益,行万里路,结识各种人,周洋觉得自己对国家与社会有了更加“具象、鲜活、生动、丰富的一个认知。”“教育”“阅读”这些词汇的含义不断被加深,他的人生体验也不断被丰富。

如今,多阅公益机构已经是上海标志性阅读推广机构,也是上海最大的流动儿童服务机构,同时在去年启动了百万乡村儿童阅读陪伴的公益行动,周洋希望未来能够帮助更多的青少年通过阅读“立德立心立志”,让更多人爱上阅读,让阅读成为更多人终身学习的一种方式。

全职做公益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但周洋觉得公益不应该仅有这些人做,“公益可以成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在周洋看来,公益可以从每个人的身边开始,可以一年、或一个月做一次,公益不在小,而在于真正帮到他人,在这个过程中,也会让自己成为更美好的人。[F]

笃志

2021年共有291位研究生新生(其中, MF项目75位, DDIM项目77位, DS&BA项目50位, GMiM项目39位, 硕博连读项目及卓博生共50位)加入学院大家庭, 分别来自16个不同的国家; 国内的学生则来自25个不同的省市。

听他们初见复旦的印象和感想, 畅想与梦想。

这是一个关于“自觉自律自立自强, 成长成熟成才成就。”的开始。



MF

金融硕士项目

DDIM

国际商务硕士双学位项目国际管理方向

GMiM

国际商务硕士双学位项目全球化经营与管理方向

DS&BA

数据科学与商务分析硕士项目



关若萱:新的征程 尽情书写

来自五湖四海我们今天都汇聚在这里,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管院人。我们都在最好的年纪来到了管院,顶着“管院人”的头衔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大家好,我是来自 DDIM 项目的关若萱,很荣幸今天能有这个机会代表 2021 级 DDIM 的全体新生进行发言。

part1:为什么选管院

还记得去年春天参加第一期领创营的时候,我穿着和

今天一样的衬衫,紧张地面对着电脑屏幕回答着一轮又一轮的提问;我也曾在英语自由辩论结束后,关闭了摄像头长叹一口气,回温着自己磕磕巴巴的英语论证和驳斥,同时为了刚才应该说出口却来不及及发言的表现而感到遗憾。我就这样,既兴奋又担心地体验着我人生中第一次、相信也是管院的第一次线上面试;也很幸运地在数日后收

获了来自心仪项目的 offer 邮件,在徐家汇的车水马龙中几乎掉下喜悦的眼泪。

虽然已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当时投递简历时的紧张、面试时的自信、等待 offer 时的焦虑、和真正收到邮件时的激动都还历历在目;而我选择管院、选择 DDIM 项目的理由也是一样明晰:雄厚的师资水平、优质的校友资源、强大的职业发展团队、与海外名校交流的机会、学校“以学生为本”的人文关怀、甚至是丰厚的奖学金……对我来说全都充满了吸引力,相信对台下的各位而言也都一样。

因此,来自五湖四海的我们今天都汇聚在这里,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管院人;在两到三年后,我们也即将从这里出发,踏上人生新的征程。我相信,能够在复旦的校园里与各位管院人共行,这就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part2: 管院前期带给你的体验

虽然还未入学,但在加入管院的这一年内,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大家庭的软硬实力。

在疫情期间虽然大家不能见面,但本硕博教育中心持续不断地开办了线上的各项活动,例如分享会、云上工作坊以及实习资源的共享等;拿我本人作为例子,我也曾预约过 CDO 老师的职业咨询热线,管院职业发展团队的专业度透过电话线也能很好地传达给我,不仅为我在实习选择和职业规划上答疑解惑,也温柔地建议我在开学后线下继续进行深入地、专业性更强的咨询。这些点点滴滴的温度累计起来,都足以让即将入学的准管院人们感受到了管院的温暖氛围。

在此期间,作为上海本地人的我也很幸运,参加了

三次管院组织的破冰活动。虽然很遗憾的是,我是一个教科书般的社恐,内向的性格让我每次都只能一个人躲在角落“瑟瑟发抖”,只留下一条腿在舒适圈的边缘疯狂试探。但好在热情分享工作经验的学长学姐们,以及UPEC的老师都会主动与我交谈,让我能够只靠这一条勇敢踏出舒适圈的腿,就收获了对于不同行业的更深的认识,也才因此有机会能够站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part3:今后的一些期望

2021级的各位管院人们,我们都面临着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角色转换,在紧张的学业和忙碌的实习中,找寻可能暂未拿捏住的work-life balance。路漫漫其修远兮,

仍等待着我们去上下求索。在这短暂的研究生生涯中,希望我,也祝愿台下的各位管院人们,都可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既要珍视学校提供的课程,通过努力学习来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也能抓紧最后的实习试错机会,逐步明晰并确立自己的职业规划,当然在其中也要善于把握住宝贵的校友资源,搭上这班管院提供的“顺风车”;最后,也要在与身边的同学同行的时候,珍惜这段宝贵的同窗友谊,互相扶持才能走得更长久。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也相信管院会呵护我们的每一个梦想,并帮助这些美梦成真。我们都在最好的年纪来到了管院,顶着“管院人”的头衔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我们也将未来从这里出发,遵循着“笃学立业,厚德惠人”的院训,不断奋斗,不留遗憾地去尽情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谢谢大家! **F**



武岳志:这是我梦想发芽成长的地方

我知道这就是能够让我的梦想发芽成长的地方,我相信大家都会积攒下很多闪闪发光的记忆。当我们再回头看,在通往梦想、成功和信念的道路上,除了坚守的岁月和功夫不负有心人的质变,还有这些鲜活的记忆。

亲爱的老师们、师兄师姐们、新生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2021级硕博新生,武岳志,非常荣幸能代表硕博新生致辞。

今天我们在此相遇,一起迎接一个崭新的未来。虽然疫情偶有再起,但我们依然能齐聚一堂,我想先感谢学校、学院各位师长为筹办新生典礼花费的心力,你们辛苦了。我也欢欣鼓舞地迎接新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乃至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将在这里一起度过也许是最后一段学生生涯。我们分别从不同的地域、院校、家庭而来,不同的原因和多样的背景故事促使我们来这里追寻梦想,所以今天我想谈谈是什么激励了我们。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从战争年代,筚路蓝缕,到现在国泰民康,一代又一代的复旦人,坚守着他们的信念、理想,薪火相传,砥砺前行。激励着他们的是一个宏大的理想。立足“扎根于进步的中国,致力于创新性研究,培养兼具国际视野、又深谙中国国情的学术专才、商业精英和社会领导者”,复旦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商业精英和前沿学者。复旦管院于1985年恢复建院以来,就站在改革开放的潮头。管院学子们也许梦想着将贫穷在中华大地上除名,先富带动后富,也许梦想着将前沿的技术引进乃至将其培育在一个更优秀的市场环境,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许,他们只是在参与商业的一隅,窥探到了一些低效率,想把商业的公平带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抑或,他们只是在穷困时共情,是否普天之下皆有广厦千万。时至今日,作为世界的一份子,也许一些人的梦想是将其共赢带到世界的其他角落,利用中国的经验,中国的视

角,帮助解决一些世界的问题。

激励我选择学术道路的初心也是这样宏大的理想。去年夏令营,虽然疫情阻隔了我与光华楼的初见,但是在线上依然得到了和管院老师沟通的机会,我被老师们的博学和经验所折服。管院的硕博项目以国际主流商学院博士培养模式为标杆,全力培养学生成为既具有国际学术视野和开阔思维、又对中国问题有深刻的理解,全面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富有潜力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型学者,我知道这就是能够让我的梦想发芽成长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跟随知名学者学习,可以和富有潜力、创造力的同学和师长们沟通,可以通过校企合作平台以及优质的校友资源,探访商业前沿。此外,管院还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国际化交流机会,能够真正将学生培养成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

当然,在这个很多工作的边际收益都逐渐向无风险收益均衡的时代,我们的梦想似乎更在生活中具象化。生活中的确幸让我们感到幸福,激励我们前进的也许是旦复旦的生活。今年最让我幸福的意象之一是早餐店里,在朝阳下闪光的溏心蛋和一杯刚制成的咖啡。我想大家的脑海里都有这样的意象,也许是江边的摇曳的柳枝,也许是一首遥远的歌,也许是一对恋人的背影,我也相信在管院,大家都会积攒下很多闪闪发光的记忆。当我们再回头看,在通往梦想、成功和信念的道路上,除了坚守的岁月和功夫不负有心人的质变,还有这些鲜活的记忆。

穿过雾霭森林寻找美,我预祝大家前途光明,也祝大家勇敢。谢谢大家。📷



郑秀：奇妙且收获满满的旅程

我对这里丰富实用的课程和同学之间互相鼓舞的学习氛围非常满意且受益良多。如果能有更多的时间来体验这些，那无疑将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各位下午好！我叫郑秀，很高兴也非常荣幸能代表今年的GMiM项目同学，跟大家分享我作为新生的一些感受与想法。

首先，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为什么选择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以及为什么选择GMiM这个项目。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在于，管院和伦敦商学院都被公认为全球知名商学院，在各大榜单中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对于我们商学院的学生而言无疑是进一步追求金融教育的完美去向。而作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一名本科生，我对这里丰富实用的课程和同学之间互相鼓舞的学习氛围非常满意且受益良多。如果能有更多的时间来体验这些，那无疑将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除此之外，我也坚信GMiM这个项目是帮助大家找到一个好工作的绝佳平台，这对我们商学院学生而言显然也是极具吸引力的亮点之一。在我大三申请这个项目的时候，管院贴心且到位的CDO服务和非常强大的校友网络已经在我找各类实习的过程中给予了我很多帮助。我坚信，这些方面对我未来的正式求职甚至长期的职业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在保研期间坚定地选择了GMiM这个项目。

此外，我还想与大家分享我过去一年在伦敦的经历。坦白来说，这一年确实挺难的：由于新冠疫情，我在伦敦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了LBS附近的一个公寓里，和3位室友一起进行自我隔离。与往年更加丰富的线下活动相比，可能确实有很多是我没有体验到的；但我觉得，这一年对我而言仍然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收获非常丰富的一年——在LBS这所全球领先的商学院里，我接收到了囊括学术知识、综合软技能、以及求职相关的

的非常全面且系统的培训；我感受到了LBS领先的职业发展中心的全方位支持，包括简历修改、Career Centre老师1对1指导、MBA校友模拟面试等环节都在我的求职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认识了很多在其他情况下我可能永远不会遇到的非常优秀的同学和校友；我与我的2次学习小组的来自全球各地的组员们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我不再害怕networking，渐渐适应了各种商业场合中的社交活动；我甚至学会了烹饪这项重要的技能，因为在伦敦吃饭真的很贵；当然，我也很喜欢当地的文化和伦敦特有的氛围。对我来说，这绝对是一次奇妙且收获满满的旅程。

最后，我也很乐意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在管理学院的下一学年的一些期待与展望。正如我刚才提到的，作为复旦管院的本科生，我已经在这个校园待了4年，所以我很清楚在后面迎接我们的将会是多么有意思的一年。我期待与我们管院所有优秀的老师见面，相信这一系列丰富的课程，即使是虚拟的，也足以让我们受益匪浅；我期待认识我们项目所有优秀的同学，有些遗憾的是，由于这个疫情，去年并不是所有的GMiM同学都有去到伦敦，但我坚信，从现在起，我们将在一起度过非常充实的一年；我期待我们CDO老师们全方位的支持，特别是各种硬知识以及软技能的培训，以及每天大量的实习岗位的通知；最后，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参加并且享受我们丰富多彩的UPEC课外活动。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也衷心地祝愿在座的所有同学都能在我们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度过一段有趣而有意义的旅程！



周瑞民：冷静的头脑，火热的心肠

放眼望去，数字化正以极高的加速度进行着，我们正站在一个新型文明的开端。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我们的目标函数里除了部门的绩效、公司的利益，还应该有一些更火热的东西。

老师们、同学们：

下午好！我是21级DSBA项目的新生周瑞民，很荣幸能作为新生代表在此发言。首先感谢管院对我们的接纳，感谢老师们的付出；也祝贺所有同学们，能坐在这里意味着你们已经取得了某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祝贺你们！

在这个夏天，元宇宙(Metaverse)成了投资界最火热的概念，自动驾驶似乎不再新鲜，虚拟偶像展示出巨大的流量潜力；放眼望去，数字化正以极高的加速度进行着，我们正站在一个新型文明的开端。笛卡尔“一切问题都转化为数学问题”的理想正在实现：数据的外延不断扩张，定量方法被广泛应用，辩论和经验逐渐被计算和模型取代，数据科学家因此被称为“21世纪最性感的职业”。管院的数据科学与商务分析项目应运而生，我们将学习如何从复杂的商业数据中获取价值，为管理决策提供理性的框架，用技术给出答案。

然而技术也在带来新的问题。当我们尝试用定量方法描述人的活动，首先就面对着一个基本问题：人可以被结构化数据所定义吗？每一条用户数据的背后都是高度非结构化的、鲜活的人的活动，海量数据向我们呈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事实细节，但这也只是冰山一角，它背后的海洋深沉而静默。去年夏天有一篇广为传播的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数据科学的应用让配送员成为系统里移动的符号，甚至高危行业的从业者；今年我们有800次打车发现大数据杀熟，有滴滴的数据安全事件。在永不停歇的数据凝视下，人们从愤怒到焦虑、无力、玩世

不恭。毫无疑问，技术提高了效率，大众享受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算法所带来的生活便利；但与此同时，当人的心智被数据化、被计算、被选择和调优，我们的社会是否已屈从于算法的设定？“说好的星辰大海，你却只给了我Facebook”，与这样的“小时代”相对的“大数据”，会把人类文明带向何方？

我的问题越问越大，也许答案很遥远，也许它们对个体来说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但我觉得，复旦DSBA的同学应当具有这样的使命，去成为数字时代的探险家，新文明的开拓者。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我们的目标函数里除了部门的绩效、公司的利益，还应该有一些更火热的东西。阿兰·图灵用“模仿游戏”来判定机器是否会思考，也就是著名的图灵测试；而我们能通过“反向的图灵测试”吗？换句话说，人要如何在—群具有人类级智慧的机器中卓尔不群？机器不会流泪，因为情感模块里没有悲伤。生而为人的同理心和正义感使我们不断思考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使命，避免陷入黑客帝国式的结局。对数据科学家来说，这意味着某种矛盾：他们必须足够优秀，同时又要丢弃一些精英主义的气质。这很难，但或许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必须尽力而为，这是我们人类神圣的责任。”

最后，请让我引伟大的经济学家 Alfred Marshall 的箴言作为结束，他呼吁政策的制定者一定要有“冷静的头脑，火热的心肠”(cool head, warm heart)。这句话正是今年DSBA班级标语的来源。知之易，行之难，行胜于言。

谢谢大家！



周润秋：保持好奇，笃定前行

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挑战，我想我们都会一同在心中默念，选择相信，保持好奇，笃定前行。我们选择相信自己，相信老师，相信管院；我们对新鲜事物保持好奇，对未知领域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好奇。

老师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我是MF新研一的周润秋,很荣幸能有机会站在这里代表MF的小伙伴们做新生发言。相信在座的各位同学和我一样,此时此刻内心都充斥了复杂的情绪,在这里我想与大家分享。

首先,就是憧憬和期待。我们憧憬着未来两年的校园生活,憧憬着食堂和体育场,憧憬着去光华楼前拍一张游客照,发在微信的家庭群里。我们期待在管院认识新的伙伴、结识更多有趣的灵魂,期待在职业发展的道路上大展身手、一展宏图。

其次,我们会发现内心既会喜悦又会焦虑。我们第一次踏进管院楼的一刻,意味着我们一年前的保研征程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意味着我们完成了从本科生向硕士生的成功蜕变,意味着我们正式加入了管院这个专业过硬又充满温度的大家庭。同时,我们多多少少也会感到焦虑,焦虑即将迎来的硬核课程学习和课业测验,焦虑即将面对的富有挑战的实习工作。

再次,是感到疲惫却又充满斗志。相信许许多多的同学和我一样,离开了曾经的舒适区,即将在新的环境中独自打拼。我们离开了熟悉的宿舍,开始自己租房自己生活。日复一日,我们会对工作实习感到疲惫,会对往返通勤感到疲惫,会对独立生活感到疲惫,甚至会对外卖软件上一成不变的菜单和重复的菜品感到疲惫。但我相信在座的大伙都知道,商科、金融的求索之路必然是一个厚积薄发的漫长征程,我们时刻准备着应对挑战,时刻充满着斗志。

此时此刻,我想我们都很难说清脚下的路将通往何方。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挑战,我想我们都会一同在心中默念,选择相信,保持好奇,笃定前行。我们选择相信自己,相信老师,相信管院;我们对新鲜事物保持好奇,对未知领域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好奇。

祝愿大家在两年后的毕业典礼上,都还是现在这般意气风发的模样。

勇敢MF,不怕困难!

谢谢大家! **F**





用数据创造价值

科创企业的经营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所以优化顶层设计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完善底层经营逻辑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生产要素,企业必须用产品和服务换取数据,用数据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复旦管院教授、科创领袖营模块主理教授钱世政在科创领袖营三期课堂上的演讲)

生物技术成硬核

制药领域市场规则发生重大变化:缺乏技术门槛的仿制药逐渐淡出市场焦点;过硬的技术和产品成为市场竞争的重点;未来技术趋势参考美国,产品价格和项目估值走中国特色;生物技术异军突起,细胞治疗、基因治疗、新抗原疫苗等未来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德同资本董事长、创始合伙人邵俊在科创领袖营三期课堂上的演讲)

创造力与组织管理

创造力是指产生新想法,发现、创造新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也许永远无法被AI人工智能企及,却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人的创造力在后天环境中可能得到加强,也可能被削弱甚至消失。从现有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在组织环境中,管理的条条框框越多,创造力被压制的可能性越大;因此,企图靠传统意义上的管理来提升创造力的公司只能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那应该怎么办呢?按照I的三次方公式,公司,尤其是科创公司,应该像欧美的大学或研究所一样运作才行。那就是招募行业最优秀合适的人才,然后下放决策权,给人以极大的自由度、灵活性、试错空间、资源支持,外加鼓励和自然淘汰。



(《管理视野》执行主编、华盛顿大学教授陈晓萍在第26期《管理视野》上“主编的话”)

用知识穿透迷雾

通过MBA学习,大家要重塑自己,努力成为一个丰满、坚毅、有知识、有能量的人,一个独立、自尊、自重、又尊重别人的人。希望在复旦学习的过程中,你们能重新修炼自己、丰富自己、充实自己、提升自己。还要重塑自己的人格,重塑人格的基础是知识、科学精神、独立判断。

大学是崇尚科学的地方,是把探究真理、维护真理视为最高使命的地方。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追求真理需要勇气,需要牺牲精神。

知识是光,老师传播知识,就是在点亮你们,你们也要去点亮别人。当今社会已进入VUCA时代,不确定、模糊、复杂、波动大。你们要用知识去穿透迷雾,致力于把所有的光汇聚起来,去照亮社会前进的方向。这是你们的责任,也是你们最高的成就。

你们不仅要去做今天来看是正确的事情,把正确的事情做正确。你们还要敢于去做十年、二十年回过头来看是正确的事情,有些事今天看起来可能不那么正确。你们要有这样的智慧和勇气,才能去引领这个社会,才能去成就自己作为未来的领袖。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教授在复旦大学2021级MBA开学典礼上的演讲)

如何应对低利率

如何有效应对低利率环境？对于个体投资者来说，第一个重要的就是接受投资收益率变低这一事实，不能有FOMO(fear of missing out)，被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收益“投资机会”诱惑。

在接受低利率现实的前提下，尽量降低现金持有，减少对政府债的投资，增加股票和有风险债券的投资，在资产种类和投资市场两个方面增加投资的多样性，多股票投资，而且应有多市场和多币种投资，甚至包括黄金。多元化投资是应付不确定市场的有效手段。

在低利率环境下，金融资本更加充裕，而人力资本将变得相对更加稀缺，投资稀缺的资产会有更高的回报。对于个人而言，在低利率环境下，投资自己将会成为最稳妥且收益率最高的选择。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金融与财务学系教授王小卒在复旦-BI(挪威)MBA项目公开课上的演讲)

游戏产业正循环

“经济大国一定是文化强国，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游戏产业也不可或缺。”当前中国的文化输出多数是实体文化产品，电影、游戏等文化服务输出占比还很小，后者其实才是真正高附加价值部分，未来大有可为。

中国游戏产业发展速度很快，市场规模巨大，但无论是监管，还是行业发展成熟度，与游戏大国相比仍有明显欠缺。正因发展不成熟，就令整体环境有很大不确定性，资本不敢进来，造成投资缺失，不利产业正向循环。

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电影和游戏分级制度是一个重要的监管手段。“监管层的主要担忧，还是在沉迷游戏对未成年人的潜在影响。”游戏产业要形成良性循环，须不断完善监管，做好游戏分级，有效控制时长，降低负面影响。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张洁接受香港《文汇报》采访时表示)

“无收入极限生存时长”

作为优秀的企业家,疫情之下,自然有此种情境下的生存法则。具体到餐饮行业,首先疫情来了,对这件事情做个分析,第一步就是预判局势。局势预判到了那怎么去应对,我之前提出过一个重要的概念,叫“无收入极限生存时长”。这是要测算的,如果从今天开始一分钱收入没有了,还能活多久。以过去的经验判断疫情影响的时长,以此为基础,对比这次影响力的强弱,调整时长。

想办法活过这个时长,可以减少支出,催收款,找到新的收入来源等等。宏观层面的大势改变不了,但可以改变中观的竞争层面,只要活得比竞争对手久,疫情过去了,就可以第一个站起来去抢夺空白的市场空间。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副教授孙金云接受《南风窗》专访表示)

理性看待“元宇宙”

现在,我们正处于元宇宙相关技术不断演进的时代。未来,技术的量变有可能引发质变,比如在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假如出现真正突破性的改变,那么虚拟世界的确有可能以更深入的形式、与真实的物理世界重叠、交融。如果虚实能在未来完美融合,那就是元宇宙的世界。

如果说过去这种虚实结合的创意情境是由导演等少数人所推动的,那么,现在它已越来越多进入普通人的想象和体验,从而成为一种亚文化。这种潮流也是元宇宙火爆的重要原因。

应该看到,当下的元宇宙还未真正出现颠覆性产品和商业模式,相关技术仍处于常规的发展轨道。VR眼镜和头盔的体验并不完美,游戏所创造的虚拟世界也远远达不到能和现实高度融合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对元宇宙话题的关注和热烈讨论,就显得有一些突如其来。

或许我们可以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看看元宇宙行业会不会在近期拿出真正有突破性的技术和商业创新,从而更好地了解背后的动因。无论如何,这个领域值得长期看好,但是在短期内要保持理性。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 with 智能商业系系主任张诚教授
《文汇报》“复旦—文汇管理学圆桌谈”)

产业链如何自主可控

总而言之,中国产业自主可控发展之路可以概括为“一个目标”、“双轮驱动”、“三链管理”。

一个目标:控制产业链的制高点,构建产业的合作网络,形成产业链的竞争优势;

双轮驱动:创新驱动和品牌驱动;

三链管理:通过企业内部价值链重构实现差异化、通过上下游产业链整合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产业链跨界融合打造现代产业体系。

通过对产业链的有效控制,打造全新的产业链生态体系,构建健康稳定、具有内生竞争力的产业体系,中国才能有望在未来真正实现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的宏伟目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系主任骆品亮教授在复旦MBA项目公开课上的演讲)

人工智能的“真相”

当下主流的人工智能技术是“深度学习”技术,这是一个容易让人误会的词,就像电“脑”与复杂人“脑”的差别。现在的人工智能还不能“深度”地理解人类在做的事,并在机器编程的基础上模拟人类,我们只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深度学习并不是一项新技术,以前叫人工神经网络,早期结构只有三层,包括输入单元层、隐藏单元层、输出单元层,四层以上就叫深度学习。后来层次越做越多,这就需要更加复杂、更加烧钱的硬件,以及更多的学习数据。人工智能从神经网络发展到深度学习,过程仅此而已。

这样的转变不是学科层面的进步,因为其工作原理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具有科学意义。相反,由于消耗的数据、资源、电力比传统系统都要大很多,运行起来存在更大风险。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英瑾教授在复旦科创领袖营人文课堂上的演讲)

数字化不能唯技术论

如何打造企业核心的数字化能力？要从战略、资本、财务、人才、风险乃至数据等六个方面进行整体谋划和管控。对于企业来说，数字化不能唯技术论，而应该是商业模式或业务模式的创新和迭代，应该站在客户体验视角重塑产品服务，提升营销能力。

在数字化转型中，企业也许会面临许多问题，在共性层面主要体现为业务的痛点及其挖掘、边界协同、数字化场景的提炼。为此，需要建立起数字化转型的专门组织协同机制，从制度层面建立保障。

推动数字化转型稳步发展的建议：一是确立清晰的业务目标；二是坚持标准化运行；三是充分运用原有基础；四是建立快速熔断机制。



（德勤中国管理咨询智慧运营服务线主管合伙人程中在复旦MBA聚劲论坛上的演讲）

数字化转型本质是人的转型

创新是数字领导力的源泉。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数字技术应用,技术背后驱动的是整个企业的方方面面,是对全价值链的解构与重构。领导人才和关键技术人才的升级和配套缺一不可。

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创新力的培育是艰难的。数字化转型本质上讲,就是人的转型,人的思想观念不转,团队组织结构不转,团队拥有的知识结构不转,体系能力不转,就是空谈。领导者要有坚定的决心和行动,组织企业的人财物资源,投入到企业内部和整个产业链、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而且数字化转型有时前面没有引领者,价值产出不明确,这是数字化领导力体现出来的责任与担当。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磊在复旦 MBA 聚劲论坛上的演讲)

半导体产品策略“三部曲”

半导体行业的产品策略是一个三部曲：

第一是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市场发展的预测，也即在进入市场前要做好市场分析，明确市场中与自身从事的技术关系最为密切、逻辑性最能自洽的部分，如果第一步预测错误，则会陷入市场误区——尽管市场看起来很大，最终依然无法实现盈利。

第二是核心技术的开发，通过自研与获得授权两条路径增强核心技术的占有能，同时在研发与开发的过程中进行快速、实时的调整，达成“决定可以不快，但行动一定要快”的收敛。

第三是市场推广与市场营销，半导体行业的 TO C 端难度极高，因此基本准则都是围绕大客户展开，因此要瞄准时机，在头部客户导入新技术之时积极介入。



(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AUTO-ID 实验室主任闵昊在复旦 MBA 聚劲论坛上的演讲)

电动汽车补贴的组合效应

全球范围内,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政府主要采取三种补贴措施。起初是对购买新能源汽车进行补贴,发展到目前,逐渐变成补贴充电桩和对电进行补贴。补车其实是直接补贴给车主,而补桩和补电可以说是补给了充电桩公司。由于空间错位的存在,所以补桩往往补不到关键点上。

研究表明,新能源汽车充电的成本在补贴政策的设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充电对新能源汽车司机来说成本太高,补贴充电桩是有利的,而如果充电足够快捷方便,补贴汽车购买是有利的。在充电成本处于中等水平的情况下,只有在市中心的建桩成本比郊区的建桩成本略高的情况下,补贴充电桩才是有利的。论文的结论是,在充电基础设施不发达的早期阶段,应该首选补贴充电服务提供商,而当充电市场/技术更加成熟,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更高时,反而应该首选补贴购买新能源汽车,并且这些补贴政策之间的组合效果也需要依赖于诸多条件。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智能商业系副教授宴一凡与合作者——香港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张帷共同完成的论文《处理空间错配:电动汽车和充电市场的补贴设计》)

平台经济的科学监管

伴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生态近年来却逐渐背离“开放和兼容”,在个别领域甚至走向了“封闭和垄断”,阻碍了数据的有序流动与用户的自由选择。

监管部门在实践中可以着眼于特定的网络生态系统,对市场参与者的议价谈判能力以及如何促进或阻碍数据流动有一定的理解,在必要的时候对解除链接屏蔽的合理价格、附加条件、有效时间和数量等给予较为明确的行政指导,既不能因过于苛刻的交易条件而迟滞实现互联互通的进程,同时也注意避免削弱头部平台未来继续投资开发与维护高价值渠道的积极性。

可以预见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人工智能、大数据、新一代通信等高科技领域很有可能会孕育出新的龙头企业。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监管部门和学界、业界的共同努力下,推进平台互联互通最终会形成科学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加强数据的有序流动也将能优化数据资源的跨平台配置,促进社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讲师伏啸《文汇报》专访)

企业的“三商”

中国企业目前最关注和最焦虑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担忧，这主要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所引起的；二是数字化转型，近年来，很多企业请我们去讲课，内容基本都是围绕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营销的，这主要是因为顾客及其需求改变了，竞争者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出现了。

我的建议是提高“三商”：一是充分提高企业对于信息、数据和知识的收集、整合和分析能力，从而提升自己的企业“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 IQ)；二是学会从顾客角度思考企业存在的价值，全面提升自己的顾客体验，这是企业高“情商”(Emotion Quotient, EQ)的表现；三是修炼自己在VUCA时代动态适应环境和改变自身的能力，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突显自己的“逆商”(Adversity Quotient, AQ)。

企业需要的核心能力，其实主要是三点：一是顾客洞察能力；二是产业洞察能力；三是价值创新能力。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市场营销学系蒋青云教授《销售与市场》杂志专访)

企业要做长期主义

企业要扩大价值,一是要做长期主义的事情,吃力但短期未必讨好;二是团队要有吸引新人、牛人的能力,保持新陈代谢的速度,以及有计划的人才“浪费”;三是创业初期的切入点一定要足够犀利,逐步扩展能力圈层与布局。

一般来说,风险投资(股权投资)就是在寻找高杠杆的生意模式,企业核心下半身的任务是构筑高杠杆的工事。外部资源层面:融资能力与融人能力;内部核心发动机:产品的竞争力;底层支撑系统:产研结构/公司的组织结构。

融资款以及账上的现金永远是表层的安全,深层的安全感的追求来源于现金的优势所转化的胜势,现金价值迁移所带来的更大杠杆的企业价值提升。



(元璟资本投资副总裁朱亦卿在复旦科创领袖营的分享)

企业的护城河和成长性

企业要特别关注护城河和成长性。关于护城河,《投资的护城河》中有关于真假护城河的论述,真正的护城河包括规模经济、垄断经营、品牌、可持续的低成本、专利和专有技术、网络效应等;而流行、优质产品、高的市场占有率、优秀的管理、有效的执行被归为虚假的护城河。企业要去不断构建自己真正的护城河,增强自己的竞争优势。

关于成长性:甄别可持续的、真正的成长,同样的机遇给不同的公司带来的成长是不同的。就像新冠疫情下,有些企业做了一锤子买卖,有些企业借助新冠场景实现了积累,并且不断延伸,不断构建企业的护城河。因此,在判断企业成长性的时候,要小心一次性成长、无利润成长、低质量成长等问题。



(中平资本副总裁李锦程在复旦科创领袖营的分享)

现金流管理策略

运营现金管理:日常运营现金,是不是有无法预期的波动;业务发展速度,现金流可能的变化;收付款稳定程度,对现金流的影响。

储备现金管理:储备现金账户管理;固定资产,研发,资本性支出管理;中短期投资管理;受限制资金管理。

战略现金管理:中长期投资管理;战略并购项目资金安排。

关于资金消耗率:要考虑随着公司的发展,支出水平会如何变化;要正确估算流动资金周转/固定资产投入需求;要确定好公司的资金安全水位,严防死守(对于亏损企业,预留至少6个月的 cash burn)。

融资节奏很重要,要避免“小步快跑”和“大步流星”——

“小步快跑”是每次融得很少,但每年融得非常频繁,这样的融资节奏导致企业如果没有安全垫,当外部市场发生改变时,很难再融到钱。“大步流星”就是融了过多并不需要的钱,减少了在资本市场的曝光率和活跃度,而这些也是投资人看重的,对于市场融资非常重要。

企业要学会用活银行的金融政策,它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起到了“补短板”的作用。企业在获得同样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减少股份稀释,优化企业的资产结构。



(浦发硅谷银行董事总经理、首席信贷官李群在复旦科创领袖营的分享)

北交所应尝试T+0

目前全球的交易市场存在竞价交易和做市商制度等多种形式,而国内市场采用的都是竞价交易。在流动性比较好的情况下,竞价交易不需要做市商;但在流动性不好的情况下,没有做市商干预容易造成交易停滞的“死局”。北交所要在市场层面确保流动性,可以考虑更好地发挥做市商制度对稳定市场、促进价格发现的功能和作用。

从交易机制上看,北交所允许的最大涨跌幅是30%,但不允许日内进出,这是交易规则的不配套。因为,这就意味着投资者一旦选择在北交所交易,就需要承担更大的日内价格波动风险,而没有相应的对策。长此以往,投资者会因为担心风险而少交易,那市场的活跃度也势必会受到影响,造成流动性的流失,不利于市场的发展。

国外的交易方式已经不只是T+0,而是发展到微秒、纳秒级别的高频交易,市场也并没有崩溃,可见市场的承受力实际上超乎想象。我想,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的尝试,如利用数据手段甄别投资者类型,对可能存在较大风险的交易要求更高的抗风险能力,限制交易次数或日内交易额等,尝试T+0交易方式,配合30%涨跌幅,给市场韧性以试验的空间。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金融与财务学系系主任蒋肖虹教授专稿)

供应链管理的本质

供应链管理的本质,是匹配供应和需求。在很多人心目中,供应链等同于物流,二者虽然有交叉,但并不相同。就像把加州的橙子运到中国来卖,或是把新到的商品储藏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物流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产生价值,例如怎样通过运输的决策、库存的决策、选址的决策等等,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创造价值。

供应链管理同样面对降本增效的问题,但功能在于通过上下游的协作、企业之间的整合降低成本、创造价值。不是考虑你的小地盘小利益,是大家来合作,让蛋糕做得更大。

在当前的时代里,没有任何行业能把供应链置之度外。不管是服务企业、平台企业,哪怕是创业公司,其实都需要供应链管理。而在企业内部,供应链管理也不仅仅是某个职能部门的事,而是全行业管理者都应该具备的视野和思维。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系教授陈祥锋在“复旦管院高层管理教育”的专稿)

智慧和德行

《世说新语》中提到的魏晋玄学的一个话题,就是“四本论”中才性同异的问题。这差不多就是智慧和德行的关系,智慧和德行是相合的还是相分离的,两者是不是可以合为一体?

这个古老的命题跟我们现在的生活什么关系呢?如果你认为智慧和德行是一体的,并且如果一体是以才为主,而不是以德为主的,那么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以才为主的世界是数字化的世界,是一个精确计算的世界,所有的一切都仅仅是精确计算,道德也是精确计算,道德是一种获得利益的技巧。这并不很遥远,如果这个世界以机器人的方式来统治的话,这个世界就是数字化的世界。

并且,这样一种看待人生和看待社会的方法,在我们身边其实是存在的。尽管极端的例子比较少,但是极端的例子的存在,表明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这样一种生存方式正在形成。精确计算的生活方式如果成为态势,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惑,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在2021复旦大学EMBA人文盛典上的演讲)

数字营销的三个优势

数字营销战略、方法和工具,是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确保竞争力的必选项。它能大大加快企业从市场中获取营销策略反馈的速度,使得企业能够用很低的成本实现营销策略的快速迭代。

相比传统营销手段,数字营销具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它能够低成本、实时、精准地捕获市场需求的信号,并基于此来调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真正做到按需设计、生产、交付。

第二,数字营销能够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精准触达到海量的“长尾用户”,从而对市场中的“长尾人群”做进一步细分,挖掘出无数个此前被忽视、但规模却相当可观的“小众市场”,为企业增长开辟新的市场空间。

第三,当下消费者信息行为和社会活动已经全面数字化,而传统的营销手段却很难与之“同步”。企业只有运用数字营销工具,才能跟上消费者的步伐,按照顾客所期望的形式和节奏,提供信息、产品和服务体验。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市场营销学系系主任金立印教授在第18届JMS中国营销科学学术年会的演讲)

市场营销学科的未来

科创给了中国管理学者一个机会去做更多原创的管理理论研究。这里面也有很多营销问题的研究,因为新的科技革命形成新的产业,让企业的概念完全重塑,不仅企业的物理边界被打破,而且它的组织边界、产权边界也被打破。在因特网支持下可以全球运作,多地办公、随时迁移,每一个人既是消费者,也可能是生产者、研发者和供应者。在这样一个形势下,管理的问题、营销问题要重新来思考。

今天市场营销学系面对更加生动、丰富的营销实践,扎根中国大地做研究,同时又拥有更多机会跟国内外同行交流合作,从而形成了一批新的学术成果。营销学科需要创新突破,需要多学科背景的交融,通过相互的冲击、冲撞乃至冲突,来形成共识、达成合作,这是营销学的未来。

营销是直面市场、消费者的,其对现实的敏感性决定了整个管理学科对现实问题的敏感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营销学科的学者们要在整个管理学科发展中通过更多创新性研究去和国际学者接轨、对标,甚至引领,去引领整个管理学科发展,这也是整个中国营销学界对中国管理学界发展所应该承担的使命。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教授在第18届JMS中国营销科学学术年会的致辞)





李天纲：海派文化的渊源及其传承

文 / 李天纲 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

如何传承文化遗产，守住文化遗产；很多建筑是拆，是留，还是转型改造，这涉及上海各个区的很多案例，而且又跟今天的很多热门话题，比如江南文化、海派文化连在一起。讲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有一条贯穿线索，两者之间有连续性。江南文化在明清时期就已经成型，非常发达。一九八六年，谭其骧先生在一次会议上对我们说：宋明以后，“江南是当时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苏州为其都会”（《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收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国文化的中心在明清时期已经转移到江南。“苏松熟，天下足”，苏、松并重，经济上有此说法，文化也可以这么说。松江府不可轻视，它在明中叶有后来居上的趋势。最近，我们好几项研究都可以证明，明万历年间以后，多种文化活动，如刻书、藏书、科举、结社等，从苏州向松江转移的趋势非常明显。从明末“复社”的崛起，到清初“吴中七子”的扬名，再到清中叶“守山阁丛书”刊刻、松江府各县的文化活动在“五口通商”，以前都是很活跃的。明清上海是松江府的巨县，万

历年间经济就在江南达到鼎盛，乾隆年间苏松太道署移到上海，文化进步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当然不是明清“江南文化”中的例外。

海派文化是从上海开埠以后才开始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化人讨论上海社会风尚的时候用起来的术语。“海派”一词虽然不只是用来形容上海文人的，但鲁迅、沈从文等人在介入和讨论文学界的海派、京派之争时，使得这个词的含义是简单明了的。过去说“依人老海派的”（上海话），含义还是蛮复杂的，有点羡慕嫉妒，有点批评揶揄，也有点表扬赞美。当时上海人的价值观是多元的，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在“京海之争”中海派就基本上是负面的，是一种道德立场，一种外来眼光，是说这人做事夸张浮华，不守信，喜欢讲排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是一座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大都市”，什么现象都有，只用一个标签来形容上海文化，哪怕只是其中的“文学”现象，是危险的，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海派”变成一个标签，要拿它来代表一种上海的文化精神呢？一九八五年上海文

海派文化是从上海开埠以后才开始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化人讨论上海社会风尚的时候用起来的术语。“海派”一词虽然不只是用来形容上海文人的，但鲁迅、沈从文等人在介入和讨论文学界的海派、京派之争时，使得这个词的含义是简单明了的。

化发展战略讨论的时候,上海历史学界的学者,如唐振常、陈旭麓、朱维铮、吴云溥、魏承思、周振鹤和我们一些人,提出来为“海派”正名,去除对上海文化的偏见,解释它的合法性,然后甩掉历史包袱,轻装上阵。大家都赞成把“海派”推出来,作为上海文化的一个标志,把很多问题澄清一下。将近四十年过去了,一两代人说下来,现在真的拿“海派”说事了,道理上是顺的。海派文化在虹口区,那里是上海最早的五方杂处,中西融合之地,这是确定的,当年的海派研究是这么说的。现在徐汇区提出自己也是“海派之源”,也没有问题,因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海派”融合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西方文化,徐家汇是欧洲文化与江南文化融合的先鋒地区,这个也是没有疑问的。虹口的社会生活、市民生活比较发达,徐家汇则是宗教生活、文化教育比较突出。

一、上海文化的源和流

上海文化,“江南文化”是源,“海派文化”是流。受十九世纪欧风美雨

的冲击,使得这个“流”更显壮大,更显重要。毫无疑问,上海文化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近代文化,而不是一句殖民地文化、外来文化就能批倒的。“江南文化”成功地在上海地区转型为“海派文化”,讲明白海派文化在江南文化中的地位,其实不太容易,因为存在很多误区。有一些误区是过去留下来的,比如我们一直把上海定义为一座近代城市,以前没有什么历史,即便有一点的话也不重要。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宽先生做过上海博物馆馆长,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讲,六大古都(西安、南京、北京、洛阳、开封、杭州)、七大古都(加上安阳),没有上海是可以的;但是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1982)评出二十四个,其中没有上海是说不过去的,上海在明清史上是很有地位的。杨宽先生是青浦人,是中国古代都城研究领域的权威。上海文化的起源在哪里,起源于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关系到上海的城市性质,也关系到上海的城市遗产和文物保护,是要认真讨论的。鸦片战争结束后,上海开埠,因为中外贸易,上海文化发生了重大变革。二十世纪上海文化以一种全新

的姿态,形成压倒性优势。曾有一句话说:“三千年的历史要看西安,八百年的历史要看北京,百年历史看上海。”这样说大致也是对的,但把上海说成好像就是一座近代刚刚崛起的大都市,此前没有历史文化,这就不对了,可惜今天还有好多人是这么看上海的。

上海仅仅是一个近代城市吗?它的明清历史是怎样的?有没有来源、有没有传承?它的地位是怎样的?这些我们都没有说清楚,以致说了很多错话,做了很多错事,拆了很多不该拆的文化建筑。所以讲起源的时候,我们要讲两面,不单单要讲近代的上海,即“维多利亚式”的上海,也要讲明清时期江南的上海。

近代上海是五口通商城市中发展得最顺利的大都市。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从朝廷来看,这五座城市中,上海的行政级别最低。广州和福州是省城,厦门和宁波是府城,上海只是县城。不过,上海是苏松太兵备道的驻地,行使海关、海防和海运等多项职能。兵备道移沪,说明江南地区的海洋事务

集中到了上海。上海在五个口岸中处于最北面，外国人称为“北华”（North China）。洋商喜欢上海，说是上海人脾气比广东人温和，无非是开埠爽快，乐意做生意。另外，上海城市富裕，货源充沛，水路发达，拿货最方便。五口通商后，外国人集中到上海交易。十年后的一八五三年，上海港的进出口总额就超过了广州。《北京条约》《马关条约》后继续开埠，沿海港口自北向南，旅顺、天津、烟台、青岛、温州、汕头，长江港口一路往西，镇江、九江、汉口、重庆，连苏州、杭州，都开埠了。开埠城市都是城市化、工业化的先驱，上海则是上一次中国现代化的表率。煤气、自来水、电灯、电话、电影、汽车在上海首先使用，工业GDP、进出口总额、工厂总数、汽车拥有量、报刊发行量、大学数量等，都位列中国第一。举电气化的例子，一八七九年，工程师毕晓普在乍浦路用蒸汽机试验发电，点亮了路灯，和爱迪生在纽约试验电灯是同一年。一八八二年，中国第一座发电厂在南京路营业，比巴黎的第一座商业发电厂只晚了三年，和纽约的营业发电厂几乎同时。工业革命第一波——蒸汽机的时代，上海没赶上；电气时代上海就赶上了，早早地实现了电气

化。马建忠家族在远郊的朱家角镇投资建电厂，一九一二年就有了路灯，用电机来打谷碾米。

近代上海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发展，在电气化时代，与全世界主要城市相比也是不相上下。当年领先于新加坡、香港、曼谷、孟买这些亚洲城市就不说了，与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相比，上海也不差。西方城市花了二三十年建设的市政规模，上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赶上了。以英租界最初范围，即外滩、洋泾浜、苏州河、河南路四至内的密集楼宇来看，不亚于当时世界上任何一线城市，上海达成了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其实是再全球化，是第二次。第一次城市化留给我们这一代很多文化遗产，而我们却不太容易认识到它们的价值，拆了好多。

二、建城七百三十年： “南吴壮县” 是“国际大都市”的基础”

上海作为一座城市至今已有近七百三十年的历史。一二九二年上海镇从松江府华亭县划出来，设立上海县。中国历史研究把县作为基本

城市单位，设县可视为城市历史的开端，但这并不意味着县以下的市镇就没有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相反，江南地区很多市镇的文化遗产非常丰富，比如青浦的文化遗产，朱家角镇比城厢镇多。一二九二年是元至元二十九年，上海和北京一样，也是一个元代的城市。上海一直是县城，但乾隆《上海县志》就说它是“南吴壮县”，不比一般的县城，这不是夸张。上海地处吴越之间，土地高亢，土壤里的盐分还没有退尽，稻作条件并不优越，但上海人巧用地利，明初就建立了晒盐业；万历年间又兴起了棉纺织业；乾隆年间兴起了沿海沙船航运业。沿海产业造就了发达经济，“南吴壮县”的格局，为上海在鸦片战争以后发展成国际大都市奠定了基础。“上海开埠”一词，大多是说“五口通商”。其实乾隆年间正式撤销“海禁”，重新启用上海港，也说是“开埠”。这两个“开埠”意义不同，后者是近海开放，允许国内交通；前者是远洋开放，开始全球贸易。乾隆时期的“开埠”，恢复了这座城市的航海精神。聚在十六铺的上海人、宝山人、川沙人、崇明人、广东人、福建人、山东人，在康熙年间就筹建了商船会馆。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东南

沿海开禁。乾隆鉴于运河淤塞,决定漕粮不再漕运,改作海运,上海港扬帆出海的机会又来了。“五口通商”的机会降临后,上海人就加入到与欧美商人的全球贸易中。

近代上海的崛起,“以港兴市”是一个重大机遇,工商业贸易传统也是一种先天优势。明清江南和全国市场格局有两个重要的交换关系,助推了上海的崛起。第一个交换关系是江南地区的“米布交易”,因为松江府各县大量输出棉布,“衣被天下”;同时又需要购入稻米,补充粮食供应。这样,就在上海西部各市镇形成了米市和布市,朱家角、枫泾、罗店、泗泾、七宝等都是米布交易镇。第二个交换关系是上海港承担的“南北枢纽”功能,因为上海往北是黄海滩涂沙岸,要用平底沙船;往南则是东海陡峭岩岸,福船、广船吃水很深,不宜北上,需要上海卸货换沙船。如此一来,上海港就成为东南航路上的一个枢纽。南洋(闽、粤)的“南货”在上海销售,又把上海人从北洋(津、鲁)带回来的“北货”运回南方,这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货贸易。而且,从上海,东洋(日本)、西洋(东南亚)都可通达。“米布交易”通过吴淞江、黄浦江、太湖及其分湖、运河、长江等水路

交通,把上海和江南市场联系在一起;“南北枢纽”则是通过海运,把上海与东部沿海港口团结在一起,且具有中心地位。在十八、十九世纪“早期现代化”时期,水路是农业、手工业乃至大工业初期发展的主要交通。世界上最早发达的地区都是依赖水路交通,比如十九世纪的尼德兰、十七世纪的英格兰、十八世纪的波罗的海沿岸城市。上海也有此地理条件,它在明清时期的繁荣和十九世纪的崛起与此相关。

明清上海有三大支柱产业:棉、盐、船,在江南甚至在全国都处于支配地位。“棉”指纺纱织布。宋朝人穿的是葛衣、麻衣、葛布,但到了元朝以后,穿的都是棉布,因为产量高、成本低。经济史学者估计,万历年间上海地区的棉布的产量占了全国的八成。这八成不单单是上海县的,还包括松江府以及苏州府东面的几个县。上海三个县嘉定、宝山和崇明是从苏州府划过来的,另外七个县是松江府自己的,青浦、松江、奉贤、南汇、金山、川沙、闵行。这样就组成了上海。说“衣被天下”,是说在洋布畅销之前,本地的土布已经卖到全中国,乃至上海在万历年间就是江南最富裕的一个县。上海的盐场在金山、南汇、川沙,“团”

“灶”等地名都是遗迹。金山区最后的盐田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停产。古代食盐专卖,利润颇丰。上海海运发展起来后,到乾隆、嘉庆、道光年间,上千条沙船聚集在十六铺码头,丹凤楼下,百舸争流,这是别的地方都没有的景象。上海、青浦、崇明出现了几十个船王,如宝山朱其昂就发起成立轮船招商局,担任总办,从传统沙船业转向现代航运业。

老上海的一些社会机制,对“五口通商”后的顺利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为什么上海人更愿意与外商贸易?是“五方杂处”为“华洋杂居”做了准备。“华洋杂居”是指中外人民混合居住,这是《南京条约》开始的。“五方杂处”乾隆年间已经有了,十六铺住了广东人、福建人、山东人。上海本来是一个各路商人混居的城市,多些西洋人进来,只要官方不计较,市民之间问题不大,何况还有生意做。今天保存着一些同乡同业会馆,如商船会馆、三山会馆、钱业会馆,都是城市早期融合性发展的见证。然而,更多的会馆都被拆掉了,如广肇会馆、四明会馆……

上海老城范围之内,明代遗产只剩下两处,即北城潘氏豫园和南城徐氏故居,当年被称为“潘半城,徐一

角”。这两处足可以证明上海在江南文化中地位的文保单位，一处修缮完好，誉称海外；另一处却坍塌危殆，面临拆迁。潘家三代为官，做的都是布政使、工部尚书、刑部尚书，营造出一座豪园。豫园曾占了老城约四分之一的面积，历经潘氏家族衰败、小刀会破坏和“文革”，园林学者陈从周先生在最近一次修缮中将它完美呈现。

徐光启出生在太卿坊，故居“九间楼”在南城一角。南城是做米、棉交易生意的地方，相当于万历年间的南京路。光启南路至今只七八米宽，还是明朝格局。一九六〇年因为方行先生的努力，九间楼和徐氏祠堂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后一直没有升级为“国宝”，也不修缮，与徐光启文渊阁大学士、“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的地位很不相称。前几年老西门拆除，小南门内的光启南路、乔家路就是最后一块保存明清文化的地方，前景未卜。

讲到徐光启“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的地位，正好说明“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在中西会通方面是一脉相承的。首先，江南和上海的经济在十六世纪就和全球贸易连为一体。外商住在澳门，进入广东，再经过江西、湖南、浙江，漫长商路的目的地是江南，采办的是茶叶、丝绸和瓷器。日本滨下武志教授证明葡萄牙人在

江南、日本和澳门之间，串联起一个东亚三角贸易；还有多位学者考证十七、十八世纪的荷兰人、西班牙人从印度洋、大西洋方向对华贸易，输入白银，买走欧洲人喜欢的中国制造，这是“大三角”贸易。其次，江南文化已经接触到“意大利文艺复兴”，这就是徐光启、利玛窦“翻译、会通、超胜”事业带来的效应，著名成果就是《几何原本》。明清江南的经济、文化，已经进入“早期全球化”，这是“江南文化”向“海派文化”转型的内在逻辑。

三、开埠五十年： 外来文化对海派文化的影响

如果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形的“海派文化”是影响至今的主要文化，那我一直坚持认为“海派文化”之前，还有一个“维多利亚文化”。一八三七年到一九〇一年的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era）世界经济高速发展，进步主义风靡全球，正好也是上海开埠后国际化，奠定现代城市制度的时期。因为租界制度的引入，上海与西方经济、文化、政治高强度交流。英租界在外滩，美租界在虹口，法租界在城北面。一九〇〇年，英美两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意思就是各国籍居民都可以进来。法国人不愿意合并，法租界一直

保留。法语在法租界，英语在公共租界是官方语言（official language）。租界章程、条例和文书都会用英语/法语以及汉语。所以说，上海的“西方文化”至少有两种，一种是英语的英美文化，另一种是法语的欧陆文化。维多利亚时代，英语是国际语言，法语失去了十八世纪时的优势地位。在上海，英语也以商业性强取胜，一九〇五年震旦学院的教学要把英语改成法语，学生就不答应，而独立出复旦公学。

维多利亚时代很多新兴城市都采用了英国式的城市制度，尼尔·弗格森《帝国：不列颠如何缔造现代世界》里列举英国向世界输出的多项制度，其中包括：英语，英格兰式的土地租约制度，苏格兰和英格兰式的银行制度，公共法，基督教新教主义，体育运动队，受限制的或称为“看更人”的政体，代议制的议会等。上海租界采用英语为官方语言，道台和领事共同签发“道契”，汇丰银行用英格兰簿记，会审公廨参照英美法，各大教会约束侨民、推动文化事业，青年会YMCA引进各项体育运动，工部局召开董事会、纳税人会等，相当程度上引进了一套现代城市制度，运行了五十多年，奠定了城市文化的基础。这一套城市制度不用多讲，只要举例YMCA提倡的体育活动就可以理解了。今天南京西路上海市体育局大

楼,原来是西侨基督教青年会,里面有上海体育历史陈列,可见篮球、乒乓球、足球、排球、板球、体操、举重、田径等现代体育用品,都是他们以推广健康生活方式的名义在上海普及开来的。在当时的上海,不但是诸如沙逊、哈同这些从伊拉克、土耳其、印度、东南亚来的大英帝国海外属地侨民认同英国文化,上海租界华人居民也接受了这种文化。

上海的文化融合模式是双向的,一面是华人接受西侨引入的现代城市制度,另一面是外侨接受和认可上海本土居民的生活方式。外侨来上海,开埠后最初两年内,都住在上海的老城里,这里已经是一座“东南通津”的港口城市,当然更加舒适方便,外商侨民是乐于接受的。然而,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根据清朝官方“华洋分居”的要求,领事馆和外侨搬出城里,按上海道台宫慕久与英国领事巴富尔签订的《上海租地章程》,开辟租界,到北郊乡下建设新市区。后来,法国领事敏体尼、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也得到了法租界(1848)、美租界(1848)。租界“北市”和华界“南市”分治,互相竞争。后来华人大量进入租界,但中外文化的融合就是由租界制度主导了。

租界和华界,在制度上就是分治,中外人种、语言、宗教、习俗和文

化上并没有系统性歧视。文化上或有隔阂,但不会有严重的种族问题,也不可能严重,因为华人数量、市场规模和江南文化传统放在那里。一八五三年“小刀会”起义产生的难民潮涌入了租界,“华洋分居”的局面一去不复返。英、美租界引进十九世纪英国成熟的现代市政管理制度,与界内华人共享。与封闭、腐败的清朝体制相比,现代法制更能为租界内市民们接受,渐渐出现了现代法制体系下的文化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说简单了,就是各个地方的人都来了。来了以后,遵守同一个制度,但还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方言、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职业特征……过去苏州人、宁波人、广东人、福建人在上海都有各自的职业特征,说家乡的方言。今天的上海话,是由本地话、苏州话、宁波话,以及一部分的广东话融合形成的。说上海排外是没有道理的,最早突破地域限制,保存文化多样性的就是上海。今天各地都有了异乡人带来的风味餐,但上海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餐饮多样化。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是西餐,上海人不把西餐当外国餐,章太炎三天两头在福州路二十二号“一品香”吃大餐。一品香是中西融合派的澳门葡国餐,正是这个融合模式的并存与过渡。比如罗宋汤,

是白俄从长春、哈尔滨带来的,已经是上海家家户户的日常菜。年轻人不识,说是香港菜,其实是从上海传过去的,色拉、罗宋汤在香港的普及程度远不及上海。上海人可以本埠,可以客帮,也可以西洋,练就了各种“多样性”。

方言最表现“文化多样性”,上海就曾有各地方言。有各地方言在使用,就能培植出各种地方戏曲,于是各种地方戏,评弹、沪剧、越剧、锡剧、淮剧、黄梅戏……都是上海诞生和传播的。有一个现象,现代地方剧很多不是当地产生的,是在上海、天津、汉口的租界里生成的。比如越剧,不是在宁波而是在上海形成的。今天这些戏都消失了,因为方言多样性没有了。戏曲演出早期在福州路茶馆、戏园,后期转移到虹口的影院、剧场。为什么说虹口是海派文化的发源地?因为各地籍贯的市民分野鲜明,方言人口密集,文化认同多元,影院、剧场也集中在一起。日日夜夜地演出,一折一曲地学唱,就形成了上海的地方戏传统。如今,文化多样性正在消失,连滑稽戏的方言基础也在流失,这就引起了文化传承问题。

四、海派文化:融会与持守

一九八六年,上海文化发展战略

研讨,上海史研究倡导者唐振常先生提出“海纳百川”的说法,形容上海再一次“对外开放”,或即现在我们讲的“再全球化”。“再全球化”是加州大学华志健教授和我一起讨论提出来的,上海电视台纪录片《外滩》和《大上海》都用了这个概念。后来,市政府把“海纳百川,追求卓越”标注为上海的城市精神。再后来,新一届市政府又延伸出“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成为现在所用的“十六字诀”。

“海纳百川”出自林则徐的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我以为“海纳”是融会,“壁立”就是持守。上海既要以包容、接纳和融会来扩大自己的文化阵营,更要以梳理、持守来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两者不可偏废。上海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是一个传统,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坚守自身,我们把它叫作“壁立千仞”,就像大山不被动摇,有尊严、有原则地传承下去。

上海的开放是两面,一面是对世界的开放,一面是对内地的开放,两者缺一不可。上海要双循环,只讲内循环就不是“海派”了。上海的历史地位和地理位置决定它要更加注重对外开放。你看外滩,整个外滩,北外滩、南外滩、东外滩,它的岸线都是到全世界去。外滩像敞开的双臂,是“海纳”;南京路和外滩垂直,沿南京

西路——愚园路——虹桥路——三一八国道,一路往西,到江苏、浙江,通往“江南文化”腹地,把江、浙和内地的资源带到上海来,再输送到世界,反之亦然。

“海派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能化解和吸收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上海的族群关系模式,还是各界融合。海派文化的特点,不是对立,而是融合。一定要给“海派”作一个定义,我会说它是一种“贯通古今,融会中外,吴越文化为基色,华夏文化做主体,吸纳东西方的文明,在近代商业社会下培育起来的、多元的城市文化”。“海派”没有出现在同属“江南文化”的苏州、杭州、扬州,或者南京,原因就是只有上海处理了“融会中外”的复杂而艰难的关系,形成模式。

上海不但融会了英美商业文化,还消化了更加精致、更强调生活和艺术的法国文化。上海的音专、美专,以及派生出来的音乐、舞蹈、美术生活,开始是在虹口,后来就移到了更加适宜的法租界。法国、俄罗斯、犹太、奥匈、葡西籍的艺术家带出了一批华人艺术家,从任伯年到周湘、刘海粟、徐悲鸿、颜文樑、张充仁都深受熏陶。法租界之外还有徐家汇土山湾,徐悲鸿称“土山湾乃西洋画之摇篮”,中国的油画、水彩画、水粉画、雕

塑、彩色玻璃最初都是从这里传授的。徐家汇土山湾不单单是海派文化的发源,也是近代中国文化的发源。所以徐家汇土山湾也是上海文化的一个源头,也可以说是海派文化的源头。徐家汇的“摇篮”很多,天文台、气象台是一八七六年建的,中国和亚洲的第一座;土山湾印书馆是中国最早的印刷机构;博物馆也是全国第一个,后来送给了震旦,变成了震旦博物馆,后加入了上海自然博物馆。

“外滩源”和“徐家汇源”,一东一西,十多年前命名,体现了“海派文化”的融合能力。外滩源保存了公共租界的英美基督教文化,徐家汇源保存了欧陆天主教艺术,都被吸收到上海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协进会、青年会、浸会、广学会等总部大楼都在外滩源,它们支撑了上海出版、教育、新闻、医院、学校等,留下来的机构今天都在使用。徐家汇源的天文台、气象台、藏书楼、博物院、徐汇中学仍然重要。徐家汇还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源地,一八九六年创办的南洋公学,一九〇三年的震旦学院,一九〇五年的复旦公学,都是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大学。

我们说“海纳百川”是包容和融会,“壁立千仞”是梳理和持守,那什么是“海派文化”应该持守的原则

呢？一个文化总是会有自己的稳定的特征，以及可以持守的原则。什么是“海派”，什么是上海人？这种问题太难回答了，但是有些特征还是可以梳理，可以解释。比如说方言，以前大家都说家乡的苏州话、宁波话、苏北话、广东话，但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慢慢融合成上海话。伴随着语言、习俗、信仰的趋同，知识背景、历史事件、社会危机的共情，自觉的主体意识和身份认同就会出现。一种积极的共同体身份意识，可以帮助建立文化自豪感、维护文化遗产，珍视生活，凝聚社区。上海文化的主体意识一直是开放的，它不会形成保守的、排外的观念。开放的意识下的主体意识，是有积极意义的。

“海派文化”中哪些原则是需要持守的？人们甚至会问，上海的市民精神中是否还有一些积极原则，不是说海派就是小市民文化吗？我们当年选择用“海派”定义上海文化时，就不认为“海派文化”是小市民意识了。上海文化蛮大的，大城市、大工业、大历史，是“大市民”，是有现代底蕴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上海市民的内底是法治的、现代的东西。我想把一九三三年讨论上海城市精神的一个定义拿来说一下，当时工部局请了一位英国大法官费唐，他定义上海租界有四个原则(Four Princi-

ples)，说的是自治(Self Governance)、法治(Rule by Law)、自由(Freedom)和安全(Security)。法制观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被提炼出来，写在城市原则里面。这样的市民精神，说小是小，说大是大，我认为上海是有“大市民”的。

上海为什么在一百年中崛起？根本原因是现代市政制度。工部局、公董局、会审公廨、总商会、马路商会，这是一个系统。法治环境下，租界判案采用英美习惯法，华界虽然用内地律例，但也受了很多影响，做了不少改良。现代法律精神扩散到南市、闸北、江苏、浙江，整个江南文化也受到影响。法官和律师由东吴大学法学院培养，已经融会到本土教育中了。东吴法学院在上海是不亚于交大、同济、圣约翰、震旦、复旦的一块招牌，一九四五年东京审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加入关贸总协定谈判，都依靠了东吴法学院的毕业生。上海和江、浙，是香港之外最熟悉英美法的城市和地区，比较容易和国际事务接轨，市民精神中也有较多的习惯法意识，这是容易察觉的。

还有很多的案例可说，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持守，有乐观，有悲观。外滩源和徐家汇源是成功案例，效果很好。但是，如果我们更早进行保护的话，情况就会更好。徐汇滨江、杨

浦滨江已经完工了，我也认为当初可以在杨树浦路、平凉路、扬子江路、黄浦路上保留更多的文化遗产。目前严峻的挑战是北外滩，那里可真是“海派文化的发祥地”。怎么传承海派？如何持守文化？巨大的城市更新运动面前，我们的文化如何重建？我们的城市意识和身份认同又如何优化？这些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总结一下，上海是一个复杂的大都会城市(sophisticated metropolitan city)，既是五方杂处，又是华洋杂居；既有多元文化，又有普遍认同；既开放胸襟，又强调主体意识。上海文化的好处在于它可以从地方认同，慢慢扩展为全球认同，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既要讲自己的独有的文化价值，又要讲全球化的符合人性的普世价值。上海的全球化是一种有地方特色、有本地限制的全球化，就是一直讲的“全球-地方文化”(Glocal Culture)；没错，“海派文化”曾经是，也应该是“海纳百川”，但放在今天“全球化”受挫，又要坚持的环境下，我们还应该同时用上林则徐这副著名对联中的下联，即还要有一种“壁立千仞”的态度，对全球化做出修订和补充。“壁立千仞”是一种有原则、有尊严、有态度、有选择的包容，目的是开展一种有效果的融合，形成良性的社会认同。^[4]

(原刊于《书城》2021年9月号)





iKwok 奖学金捐赠

近日,在2021本硕博教育中心(UPEC)研究生开学典礼上,iKwok奖学金捐赠项目正式宣布再次签约。

新一期的iKwok奖学金在上一期的基础上覆盖面及奖项方式都进一步创新和提升,奖学金类型将扩充为两类,包括入学奖学金和学业表现奖学金;支持的学生范围将涵盖GMiM和GMiF两个项目,人数也将从前一年的三年12人次扩充为三年30人次。

2016年,郭梁洁芹女士捐赠设立复旦大学管理学院iKwok奖学金。iKwok基金每年提供给学院GMiM项目一定的新生奖学金,并向GMiM项目学生提供到新鸿基地产集团实习和就业的机会。去年,于郭梁洁芹女士的再次助推下,两所学院进一步达成合作,新设两年制(专业学位)金融硕士——全球化国际金融方向(Global MIF,简称GMIF)双学位。2021年,郭梁洁芹女士也决定支持第二个三年的iKwok奖学金。

EMBA 人文盛典举行

2021年10月16日,“2021复旦大学EMBA人文盛典”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行。

本次人文盛典延续了“艺沁人文,笃志商道”的主题,以“大变局中的我们和世界”为线索,引导大家读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家、社会、企业到个人多个维度,在大变局的不确定性中,找寻确定性。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家、高校学者、复旦校友通过长达6小时的实况直播领略这一思想盛宴。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党委书记袁新、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殷志文出席并致辞。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华为蓝血十杰胡赛雄、上海科技大学创意与艺术学院副院长王受之、河南青年电视文艺新锐导演陈雷、艺高高创始人曹启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分别从“世界如何看待我们”“我们如何看待世界”“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我们如何看待未来”四大方向,发表主题演讲。

最佳国资基金管理人

2021年10月18日,主题为“践行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升级”的首届最佳国资基金管理人颁奖典礼暨 2021 国资基金(台州)高峰论坛在浙江省台州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行业专家、国资基金50人论坛成员、全国地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创新联盟成员单位领导、相关企业领导等200余名嘉宾与会。

本次评选活动由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国资基金50人论坛三方联手举办。评选自2020年12月正式启动,从调查走访到评定结果历时近一年的时间。共设置了5个机构类奖项、3个人类奖项以及1个年度大奖,共有26家标杆机构及30名优秀个人获奖。其中,上海国盛资本、浦科投资、越秀产业基金、君和资本、金浦投资荣获2020年度最佳国资基金管理人的年度大奖。

四大项目全球50强

2021年10月18日,英国《金融时报》(FT)发布全球EMBA项目排名,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四大项目位列全球50强,复旦EMBA项目上升至全球13位,复旦大学-香港大学IMBA位列在职MBA项目全球第一。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参加FT全球排名的四个项目包括复旦大学EMBA项目、复旦大学-华盛顿大学EMBA项目、复旦大学-香港大学IMBA项目和复旦大学-BI挪威商学院MBA项目。排名结果显示:复旦大学EMBA项目位列全球第13位,学术研究、生源资历、国际师资比例、国际学生比例等多个分指标位列中文项目全球第一;复旦大学-华盛顿大学EMBA项目位列全球第23位,学术研究单项指标位列亚洲第一;复旦大学-香港大学IMBA项目位列全球第32位,在职MBA项目全球第一;复旦大学-BI挪威商学院MBA项目位列全球第45位,毕业生薪酬增长率位列全球第3位。

“瞰见”对话科创人物

2021年10月29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瞰见”之对话科创人物第4辑举行。本次论坛以“机器之‘心’‘共创’之美”为主题,连线美国波士顿 iRobot 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及创始人科林·安格尔(Colin Angle),邀请苏州派特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孔兵,元禾原点创投合伙人乐金鑫校友展开前沿对话,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副系主任窦一凡担任学术嘉宾及主持。

科林·安格尔以“共创力”为题发表演讲。他指出,除了产品的创新,恰当的营销手段和了解客户也是创业公司成功的必备手段。机器人行业面临着智能性不足的问题,对此,科林表示,iRobot将持续以想象力创造伟大产品,让机器人成为人类更好的合作伙伴。最后,科林也对创业者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寻找正确的答案,二是创业公司要拥有清晰、明确的商业模式。

“全球最佳”继续领先

“2021年度全球最佳商学院”排名揭晓,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荣获远东地区第二名、中国第一名。学院参加该排名已超过十年,排名成绩持续保持稳定,自2010年以来在该排名榜单中多次位列“远东地区最佳商学院”分榜单的前三甲、中国大陆第一名。

“全球最佳商学院”排名由来自150余个国家共计1000名商学院的院长无记名投票得出,客观真实地反映出全球各区域内商学院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商学院在国际化程度、品牌影响力等方面的综合实力。

本次排名是由环球教育(Eduniversal)组织的,该机构成立于1994年,是法国的一家商学院排名机构,自2007年开始,每年召开Eduniversal世界年会,并按地理区域发布区域年度最佳商学院排名。

JMS 学术年会举办

2021年11月19日-21日,第十八届JMS中国营销科学学术年会暨博士生论坛于上海举行,本次年会以“新技术、新市场、新消费”为主题,国内外80余所高校、数百位专家学者与博士生们相聚云端及线下,3天48场平行论坛,在线参会人数累计达18万人次,以思想洞见相互碰撞,探索VUCA时代下市场营销创新破局之道。

本届年会由《营销科学学报》主办,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承办,圣象集团作为合作伙伴,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和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营销管理专业委员会共同协办,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京东零售集团、金投赏的大力支持。

11月20日,第十八届JMS中国营销科学学术年会开幕式举行。11月21日,第十八届JMS中国营销科学学术年会之企业营销实践论坛继续举行,多位杰出企业家分别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出发,深入剖析了品牌力对于业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此前的19日举行了博士生论坛。

自科重点项目交流会

2021年11月19日,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办、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承办的“经济转型背景下市场营销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重点项目群2021年度交流会成功举行。

此次大会深度聚焦经济转型中的市场营销,立足中国本土实践,通过一系列尖端科研项目的落地转化,解决新常态中下的中国问题。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的专家学者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的领导和嘉宾共同出席了此次会议。

2021 复旦管理学论坛

2021年11月26日,在“2021年复旦管理学论坛”的学术论坛上,来自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和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等沪上各高校专家代表以“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建设和科研发展”为主题,就如何不断加强学科人才培养,推进学科建设满足实践需求展开研讨。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系系主任洪流教授首先代表主办方致辞。本次学术论坛由专家研究报告和系主任圆桌论坛两部分组成。专家报告中的三位教授吴肖乐、王有为、冯项楠立足管理科学与工程,通过综合运用数学、统计、经济等跨学科方法来解决社会经济方面的管理问题,并且分享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思考。

学生成长基金理事会会议

2021年12月3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学生成长基金理事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在学院举行。周健常务副院长、吕长江副院长、赵伟韬副书记、钱世政教授及十几位学生成长基金理事应邀出席本次会议。

学生成长基金理事会自2010年成立,本次会议为理事会换届会议,截止目前,学生成长基金理事会共有31名理事,由24位校友、社会各界人士和7位学院老师组成。各位理事各抒己见,大力肯定了学生成长基金多年来的发展,在运作方式创新、凝聚校友资源以及做好项目配对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为学生成长基金下一阶段的工作出谋划策,并纷纷表示会继续支持学生成长基金,尽自己所能为学院多做贡献。

“瞰见”对话科创人物年度论坛

2021年12月12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瞰见”对话科创人物年度论坛举行。本次论坛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管理教育推广与发展中心、科创办公室、信息管理与商业智能系联合发起,与上海市人工智能学会、长三角数字联盟、《管理视野》杂志、复旦大学出版社进行合作,同时获得品牌合作方沃尔沃汽车的大力支持。

论坛以“展望AI·管理WE来”为主题,邀请伦琴医疗董事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终身教授、复旦大学原副校长冯晓源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教授,展锐首席执行官楚庆,中科智云CEO兼首席科学家魏宏峰,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大数据中心副主任徐云程,云从科技集团董事、高级副总裁杨桦,氮信科技创始人兼CEO朱明杰等嘉宾进行对话,从技术、管理、伦理、青年科创家使命等不同维度展现AI科学的传承与管理科学的创新,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商业智能系系主任张诚教授担任学术主持人。





网址 : www.fdsf.fudan.edu.cn 邮箱 : liuhaiyang@fudan.edu.cn 电话 : 021-2501 1401